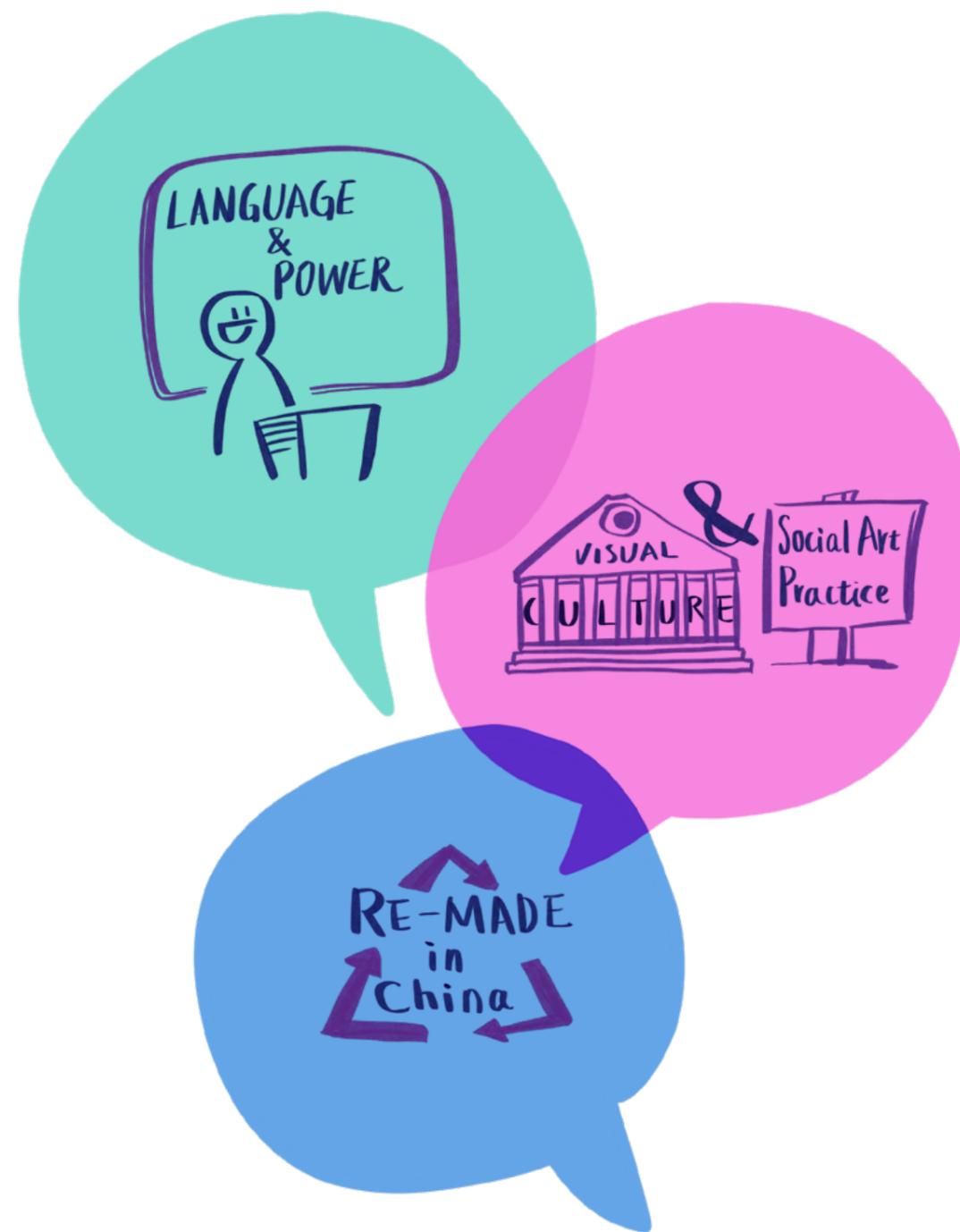


# 上海纽约大学服务性学习课程案例

## 课程与社区伙伴之声



翻译  
贾昉  
校对  
沈煜 钱春豪  
平面设计 & 插画  
谢渊沫  
MOMO 脑图工作室

上海纽约大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思西路 567 号  
邮编: 200126  
网站  
<https://shanghai.nyu.edu>  
联系方式  
[shanghai.cel@nyu.edu](mailto:shanghai.cel@nyu.edu)

编辑: 耿欣悦 **Diane Geng**  
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  
上海纽约大学学术事务部

# 目录

简介	1
<b>ENGD-SHU 101 语言与权力</b>	<b>5</b>
教师之声: Steve Iams, 学术英语项目 (EAP) 联合负责人, 副教授	9
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员工之声: 钱春豪, 社区参与式学习项目主管	16
社区合作伙伴之声: “铺路石” 上海英语教学项目经理赵莲	17
学生之声: 马桢宇, 2023届	18
学生之声: Mahder Takele Teshome, 2022 届	21
<b>INTM-SHU 271 中国再造</b>	<b>25</b>
教师之声: Marcela Godoy, 交互媒体艺术系助理教授	27
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员工之声: 钱春豪, 社区参与式学习项目主管	31
社区合作伙伴之声: 薛政, 前福筑居委会的负责人	32
学生之声: Kat Valachova, 2021届	33
学生之声: 孔晓燕, 2021届	36
学生之声: 陈恺文, 2021届	39
<b>ART-SHU 250 视觉文化与社会艺术实践: 合作与社区互动</b>	<b>45</b>
教师之声: Monika Lin 林耀明, 视觉艺术助理教授	47
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员工之声: 钱春豪, 社区参与式学习项目主管	56
社区合作伙伴之声: 马国栋, 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员工	57
学生之声: Chelsea McLean, 2022届	59
结尾	61

# 简介



耿欣悦 Diane Geng

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 (CEL)  
创办主任  
学术事务助理教务长

上海纽约大学秉承纽约大学在全球各个校区的精神，致力于实现“立足城市并属于城市”的治学理念。这一校训不仅体现了我校地处繁华都市中心位置的特点，也体现了我校师生与周边社会环境不断加深互动的潜力。大学具备丰富的学识、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应该为所属当地社区的福祉做出贡献。同理，当地社区成员的知识 and 经验也包含许多价值，能够教导和启发我校学生和学者。通过精心设计的大学—社区合作项目，我们可以汇集不同的观点、想法和资源，为彼此共享的社区排忧解难，丰富生活。

这本手册聚焦一种特殊的大学—社区合作伙伴关系：学术性服务学习课程。学术性服务学习课程提供学分，是大学课程的组成部分。该课程围绕着学生与社区合作伙伴开展的学习项目或者社区服务为内容，将对现实世界的经验和观察融入到学习过程中来，从而增强学生对学术理论和技能的理解。

## 学术性服务学习的挑战

尽管开设学术性服务学习课程的潜在好处众多，但良好的用意只是一个开始。事实上，真正去落实课程通常比仅仅在脑海中构想学生走出教室，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要难得多。教师和学生都受制于自身繁重的工作量和紧张的课时安排。教师们可能不太了解某个社区的具体需求，或是无法找到能够很好地与课程和教学目标对接的居民群体。当地的一些居民和民间组织即使有兴趣与大学合作，也不知道应该找谁商讨潜在的合作可能，以及如何行之有效地达成合作。

## 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的缘起

上述实际情况启发了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 (Office for Community Engaged Learning, 以下简称 CEL) 在学术事务部门内成立。该办公室在有兴趣执服务学习课程的老师和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社区组织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为双方牵线搭桥并提供合作咨询。我们的小型团队为师生提供各类信息、指导和资源，协助学术课程和社区伙伴之间的合作生根发芽。我们与当地社区成员和各类民间组织取得联系，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并引入对社区服务感兴趣且有积极性的老师，使课程和教学目标与当地社区的需求一致化，从而实现各方共同受益。

## “院长服务学者”项目

为实现上述理念，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 (CEL) 开设了“院长服务学者项目” (DSS)，并将学术性服务学习课程作为其项目实施模式。DSS 项目旗下的课程可以基于任何学术领域，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将有意义的社区服务与学术专业的学习目标相结合，以及学生对服务学习活动有意识的反思。我们将服务学习整合进课程的案例包括：为特定社群提供志愿服务、基于社区需求设计产品、从事利于社区的研究活动等。

学生需要提出申请才能加入“院长服务学者”项目课程 (DSS)。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 (CEL) 会与教授合作对学生进行选拔，选拔流程包括评估学生的事前准备、选课动机和投入程度等。由于学生需要为服务项目投入

大量课外工作量并实地走访合作社区，我们需要通过这个过程选出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决心和愿意承担相关社区服务工作的学生。

## 手册宗旨

本手册面向学术性服务学习课程的教学实践者和所有对该教学模式感兴趣的人。为了从历年的上海纽约大学学术性服务学习课程中获取洞见和经验，我访谈了参与项目的各方：教师、学生、社区合作伙伴和 CEL 办公室的员工。我不想简单地要求他们重述课程收获，而是希望检视他们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的实施方式和背后的原因。这里将重点介绍以下三门课程：

- 语言与权力，一门世界语言类课程
- 中国再造，一门互动媒体艺术课程
- 视觉文化和社会艺术实践，一门人文类课程

我们将从多个角度阐述每一门课程并提供：

- 教师教学设计和所面临挑战的“幕后”知识；
- 社区参与协调员协助发展并促进大学与社区的伙伴关系的深度见解；
- 社区合作伙伴与大学合作的意愿和动机；
- 以及学生对学习过程反思和学习收获的看法

我希望这些丰富的案例中的见解能有助于读者认识到学术性服务学习在设计 and 实施过程中的细致性和复杂性，并且对大学与社区合作有所帮助。



上图：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 (CEL) 协调员钱春豪带领一组学生探索上海郊外的乡村社区。

# ENGD-SHU 101

## 语言与权利

教师之声

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之声

社区合作伙伴之声

学生之声

# 课程概述



浦东“新市民生活馆”的一群四年级学生正在玩猜谜游戏。他们的老师 Isabel Brack (22届) 在白板上写下猜谜的提示语:

“鼠标”

“网站”

“软件”

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孩按响了桌子上的铃。“电脑!”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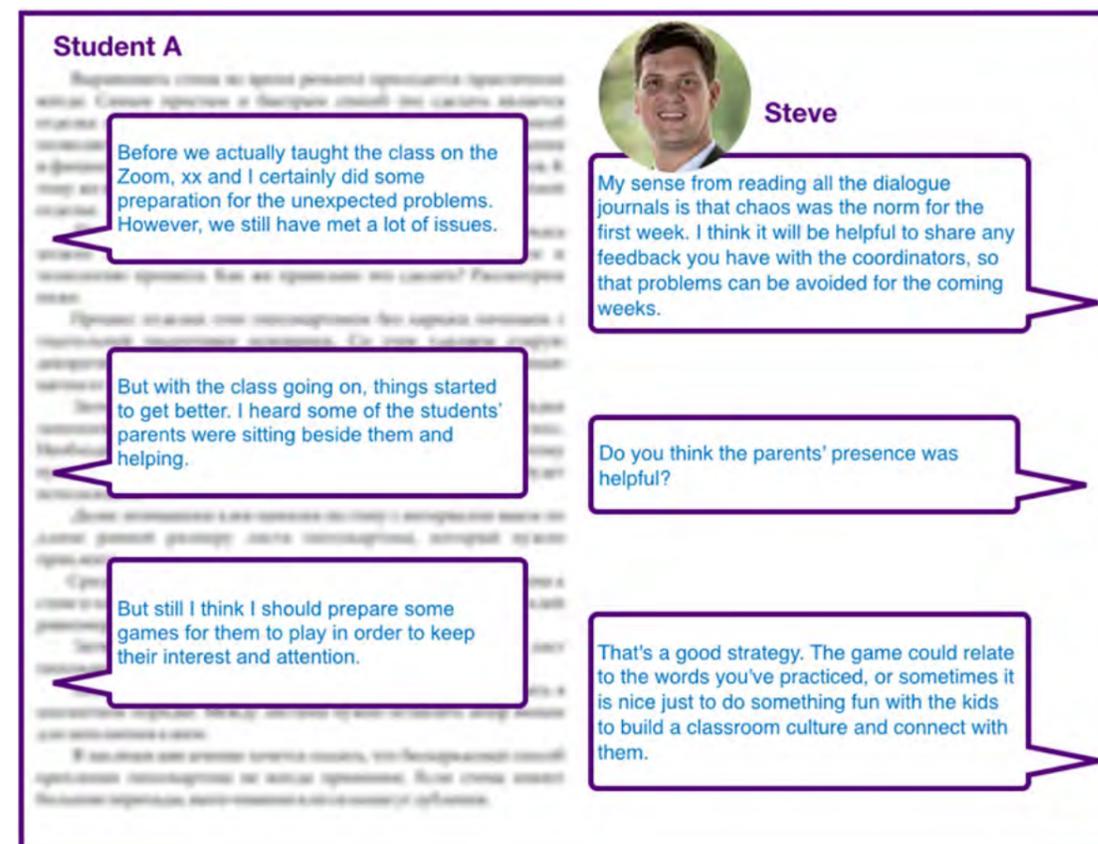
同学们兴奋地鼓起掌来。

在这个距上纽大校园约 13 公里的社区学习中心, Isabel 正在通过猜词游戏将英语带入学生们的生活。Isabel 整个学期都在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授英语, 这是学术性服务学习课程“语言与权力”课程内容的一部分。“语言与权力”是我校与上海非营利组织“中国铺路石”的合作项目, 由学术英语系副教授 Steven Iams 授课。参与“语言与权力”课程的学生须在一整个学年内里学习语言学和教学法相关理论, 并将这些理论知识运用到浦东社区中心孩子们的课堂教学实践中。

“通过课程阅读材料和课堂研讨来了解语言教学法, 然后将理论付诸实践, 这样的机会非常宝贵”, Isabel 说, “这门课将社区服务与学术研习相结合, 如此我们才能察觉到课堂学习和实践服务中‘知与行’之间的细微差别, 获得许多重要的学习体验。”

学习这门课程的基石之一是“对话周记”。这是一项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的反思性周记作业。每周会有一名学生先写下一篇周记, 分享对当周课堂的观察和思考, 然后同组的其他学生会写下第二篇(或第三篇, 三名学生为一组)周记。他们须从自身视角出发对前者所述做出回应, 进一步贡献他们的个人观察和思考。“对话周记”从教学的第一周就开始实施, 直到学期结束, 它也为学生期末写期末反思论文提供了宝贵的灵感资源。

“学生作为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我们课堂上谈论的教学理论是重合的”, Iams 教授说道, “学生们开始在教学实践中见识到跨语言



上图: 一位学生在志愿者活动后写的对话周记的摘录, 其中包含了教授的反馈和评论。

(translanguaging) 和语言帝国主义 (linguistic imperialism) 等概念, 这些意识也会影响他们的语言教学实践。看到他们将理论与实际结合, 学以致用, 我很有成就感。”

社会科学专业的 Genevieve Hendler (22 届) 发现教学经验不仅帮助她关注到“社区中的各种细微差别和尚未引起关注的需求”, 而且还改变了她看待自身语言使用差异性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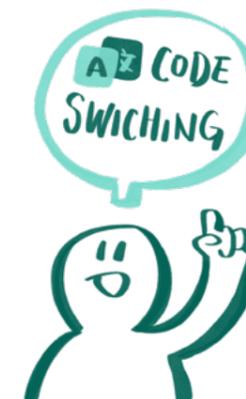
“我会说英语、汉语和法语三门语言, 但我在运用它们时总会出现‘力有不逮’的时刻, 我总觉得自己用词不准, 甚至词不达意。在学习外语时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我往往会产生挫败感。” Genevieve 说道。在教学中她注意到学生在学习英语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这让她意识到只要没有妨碍到实质交流, 就不必过分在意这些, 她先前认定的语言中的“错误”、“障碍”或“漏洞”其实是一种武断。

当 Genevieve 每周在浦东“新市民生活馆”教英语时, 她都会用英汉双语与她的学生谈天说地。

“大多数人可能误解了跨语言 (translanguaging) 和语码转换 (code-switching) 的力量。上完课后我认识到有必要让学生轻松地说出他们的需求和疑虑, 这有助于老师了解需要复习或巩固的课程内容。”

人文学科专业的张翼航 (24 届) 表示他的最大收获是认识到“双语转换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语言和权力”课程使他第一次有机会和流动儿童交流。他发现即使在同一课堂, 学生们的英文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

“有些学生的英语说得很流利, 而另一些学生则根本不认识任何英文单词”, 翼航说道。这种情况让他不断思考如何通过使用学生所熟悉的母语来解决问题、提出问题, 最终学习新的英语单词和短语, 且让他们在课堂上感到自如。“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但现在我意识到理论和实践并非放之四



海而皆准，要时刻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

除了批判性地思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Iams 教授还鼓励他的学生就语言学习的社会文化背景提出批判性问题，将他们自己的语言学习经历和学习动机与他们所教的那些年幼学生做比较和对比。

“我的学生需要更进一步问：谁从学习英语中受益？谁可以成为英语老师，为什么？他们所教学生的社会身份是什么？还有为什么这些问题对课程的设计和教学方式很重要？” Iams 教授说道，“他们必须深究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对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华语歆（24届）来说，这门课程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在上海长大，早已习惯把语言和语言教育看作理所应当的事，这门课让我意识到英语和英语教学与社会经济地位、地缘政治因素和殖民权力的联系。”她说道。

语歆说当她意识到自己所在城市的教育资源分配如此不均时，尤其是发现她教的孩子跟她弟弟年龄相仿，但英语水平远不及她弟弟时，她感到非常震惊。她意识到居住在较发达地区，经济条件好的人拥有绝对更优的英语教育资源。进一步地说，当人们想到一门全球通用的语言时，总是首先想到英语，而不是中文和其他数千种正在使用的语言。语歆说，她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是英文？”

正如语歆在她其中一篇“对话周记”中所提到的，语言与权力的关系“错综复杂，其关键在于权力决定了谁可以使用什么语言，谁使用的是所谓的‘劣等’语言。在全球化的就业市场中，语言对某些人来说则是晋升的阶梯，对其他人来说则是绊脚石。”

经过秋季学期的理论培训和授课实践，学生有机会在春季学期通过服务学习项目和个人研究项目进一步探究感兴趣的领域。有些同学会帮助公益组织设计和修订教案，有些会通过“家庭课堂项目”（Home Classroom Program）对接农村地区的学生进行线上授课，还有的同学会协助管理和推动线上教学项目的运行。

学生们的个人研究项目种类丰富，包括对应用语言学和社会文化语言范畴一系列课题的探究。语歆把语言当作切入点来反思伴随语言而来的社会特权等问题。Isabel 研究了语言中的权力特征如何随年龄增长而变化，她的研究范围从早期儿童教育一直到老年记忆保健；翼航则围绕网络视频中弹幕评论的语言学意义展开了深入研究。

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这门课程非常有意义，他们看到了年少的孩子变得更有信心说英语，也对语言学习所能改变的和不能改变的方面有了更细致的了解。“学生从这次的课程体验中获得的问题多过答案，但这依然提升了我们对现状的认知。” Genevieve 说道。

## 课程结构

Iams 教授和 CEL 办公室商讨后，将“语言与权力”设计为横跨两个学期的课程。它从为期 14 周的秋季学期的第 8 周开始，然后持续到来年春季学期的第 7 周。整个课程共 4 个学分，秋季和春季各 2 个学分。

虽然这门课程要到秋季学期中期才开始上，但是学生们会在秋季学期开始之初就安排好时间在“铺路石”组织开始志愿者教学活动，并从中获得更多服务经验，为“语言与权力”课程学习和自我学习做好准备。学生在申请加入课程时必须同意完成志愿者服务的承诺。

我们采用双学期制是为了让学生入学变得更容易，经济负担更轻。我校学

生通常每学期至少需要修读 16 个学分，但他们最多可以修读 18 个学分而无需支付任何额外学费。我们将一门 4 个学分的课分割成两门 2 个学分的课程，这意味着学生可以更灵活容易地把它纳入选课计划。这门课程的两个学期的安排还使学生能够在整个学年中加深和扩展他们的学习，并积累志愿服务经验。

以下为与该课程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的深入访谈的观点。

### 教师之声：

Steve Iams, 学术英语（EAP）实践副教授

### 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之声：

钱春豪, 社区参与式学习项目主管

### 社区合作伙伴之声：

赵莲, “铺路石”上海英语教学项目经理

### 学生之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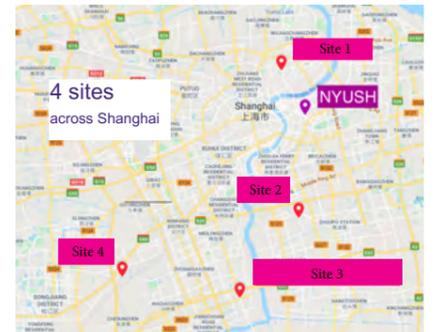
马桢宇, 2023 届

### 学生之声：

Mahder Takele Teshome, 2022 届



Cynthia Deng (25届) 和 Genevieve Hendler (22届) 正在教小学生英语。



学生们被分配到上海各个志愿服务点。

摘自：

上海纽约大学传播部（2022年4月8日）。  
上纽大公益服务课：ENGD-SHU 101B 院长服务学者项目：语言与权力。新闻与媒体报道研究创新栏目。

<https://shanghai.nyu.edu/is/using-power-language-make-difference-engd-shu-101b-deans-service-scholars-language-power>





**Steve Iams**

学术英语项目 (EAP)  
联合负责人, 副教授

“我认为学习通过人际互动和经验反思而发生, 因此设计学习任务时要为学生创设这种互动和体验的机会。”

如果谈到我基于社区参与理念的早期教学试验, 我就先要阐明自己关于有效学习构成要素方面的理念, 因为后者是前者发生的必要条件。教育家 Caleb Gattegno 认为教学隶属于学习, 换句话说, 老师教学方式必须以人类的学习方式为导向。我认为学习通过人际互动和经验反思而发生, 因此设计学习任务时要为学生创设这种互动和体验的机会。假如我们反过来用更传统的观念来看待教学, 即由老师来决定和传授教学内容, 那么课程的设计和教学模式自然也会相应地有所不同。

我从前就在那种以教科书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中挣扎过。虽然我能为了应试而吸收知识, 但那些知识从未在我的脑子停留, 所以我如今已不太记得本科阶段历史专业所学的内容, 要知道那时我的书包被厚达750页的历史教科书压得沉甸甸的。这多么可悲!

不过我也开始认识到, 任何涉及与他人互动的学习都让我印象深刻。我记得在小学时解剖过一颗牛心,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和同学站在地毯中间听老师讲解牛的主动脉和心室。我还记得“心室”这个词! 我也能回忆起小时候通过“小蛋糕生意”学习到的经济学基础知识, 当时老师居然允许只有五年级的我搞商业活动(那是一个关于创业的课程单元)。

之后我进入大学学习, 虽然我已不太记得那些历史专业的知识, 但是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在大学社区服务项目中做志愿者。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组织课外活动和执教青年篮球队的情景。25年后我仍然记得我辅导过的孩子的名字, 以及他们输掉比赛后脸上的表情。虽然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准确表述这种学习, 但我知道只有亲身体验才能实现有意义和变革性的学习。

这种过程性的体验式学习也许在潜意识中影响了我早期的职业决定, 即在日本教英语, 进入“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 一个国际志愿者组织)担任英语教学培训师。我当时需要一份体验式学习和教学相交互的工作, 这让我具备学习者和教学者的双重角色。很幸运, 那时我无需遵守很多教学的条条框框, 也没有标准化的实施流程。我必须靠自己摸索着学习、进行教学试验和课程设计, 并不断反思课堂上的有效教学和无效教学活动。我的每一天都过得既兴奋又疲惫, 这些我全都记得。

作为一名教育者, 我的使命是为学生提供类似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互动式、体验式学习, 我坚信他们会牢记互动中的所做和所学。这种学习模式包括阅读文献、通过课堂交流和书面作业与同学互动, 以及通过报告会和反馈想法与我互动。我的学术性服务学习课程还包括与社区组织和相关人员互动, 这些互动共同构成了体验式学习的基础, 也会令学习效果更为持久。

## 创设“语言与权力”课程

当学术事务部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CEL)邀请教员起草学术性服务学习课程提案时, 我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开设一门以批判性思考和体验式学习为特色的课程, 那是我本科生阶段一直没能获得的学习体验。建立社区合作关系的第一步是将我们自己代入到学生的角色中去。CEL主任 Diane Geng 将“铺路石”组织引荐给我, 这是上海的一家非营利组织, 专门为农民工家庭的贫困儿童教授英语。CEL组织我参观了“铺路石”志愿者任教的学校和社区中心。通过实地走访, 我发现“铺路石”是一个运作良好的组织, 这也反过来帮助我预设自己与学生作为未来“铺路石”志愿者一起工作时的角色。

举个例子来讲, “铺路石”举办的新教师培训和志愿者培训会让我的学生进课堂前得到足够的支持, 也会让他们对教什么和如何教有所了解。这很重要, 因为我的大多数学生都没有教学经验。不过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 由于缺乏资源, 其他的一些流动人口公益组织可能只能提供上课场所, 无法提供教师培训。无论哪种情况, 重要的是弄清楚学生将获得何种程度的支持, 这样我才能评估我所要提供的帮助。在“铺路石”的案例中, 我小心提醒自己不以专家的身份介入, 因为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我并不是专家。

我没有为“铺路石”提供教学或课程建议, 这并不是他们需要的, 而是为他们提供了后勤支持, 从而减轻管理和协助学生志愿者的行政工作量。我帮助该组织招募、分配和监督学生志愿者, 这是“铺路石”所重视的事情。我也去旁听学生志愿者的课堂, 这有助于我给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听课反馈和建议。“铺路石”的协调员和培训师竭尽全力地为大量志愿者提供支持, 而我能做的就是在这个方面辅助他们, 贡献我的力量, 而不是“不请自来”地提供他们明显已经具备的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

## 让学生做好教学准备

让志愿者们参加“铺路石”的教学培训是很有帮助的, 这能令他们了解如何帮助孩子们做好学习准备。其中刷新我们认知的一点是, “铺路石”的培训师认为用“移民”和“弱势群体”这两个术语来形容这里的儿童过于宽泛, 对现实情况也没有太多帮助。“铺路石”的服务对象是那些没有上海户口, 去那些相对缺少资源的学校上学的孩子。因此, “弱势”一词更适用于学校, 而不是儿童本身。“铺路石”服务可以为儿童提供补充性的教育支持。

就我而言, 我鼓励学生以开放的心态和灵活的态度进入他们的志愿者服务环境。我想让他们明白, 他们除了教英语之外还会与孩子建立关系, 而发展这种关系对于创设互动学习环境, 促进语言学习至关重要。鉴于学生的教学的时间有限——大约每周一小时——我试着请他们思考项目结束后希望看到的理想成果是什么, 以此调整他们对孩子进步的过高期望。最佳的教学成果真的是掌握英语知识吗? 对某些人来讲, 这也许只意味着学生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彼此见面并和老师聚在一起, 玩得开心。借用巴西教育家Paulo Freire的一句话, 我鼓励学生提供一种“值得孩子花时间”的学习体验,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有某个语言学习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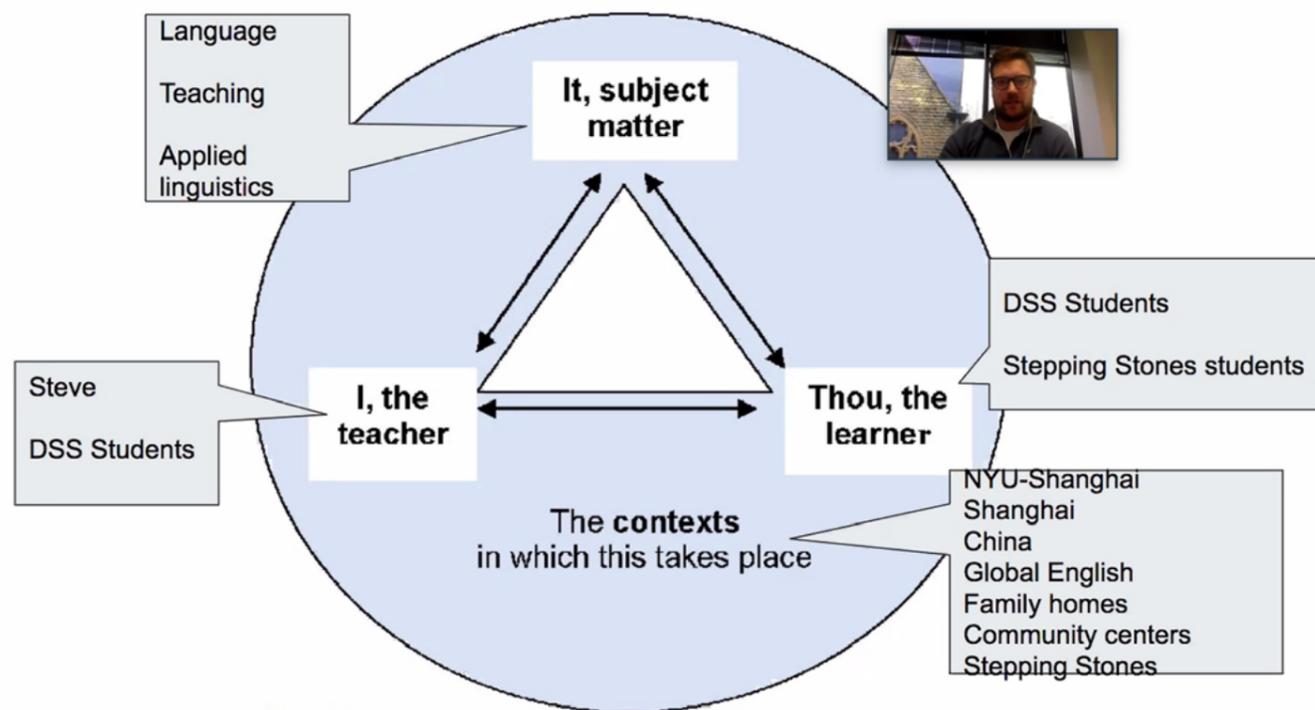
## 课程结构和作业设置

“语言与权力”课程在秋季学期共有七次课, 一次是迎新课程, 另外六次则用于讨论学生在志愿者教学环境中可能会很快遇到的语言与权力相关议题, 其中包括对服务学习的批判性思考、语言污名化(language stigma)、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ation)和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es)、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和跨语言现象(translanguaging), 以及有关想象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的身份等。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尽早向学生介绍语言变体和文化身份的相关概念, 这将便于他们思考某些意识形态如单语主义(monolingualism)或“只说英语”(English only)对多数语言课堂产生的重



“重要的是发觉学生们需要什么从社区层面获得什么样的帮助,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提供相应的帮助了”





Source: David Hawkins

上图: Iams 教授在年初向学生介绍了这门课程。由于新冠疫情导致校园关闭, 这门课程在线上进行。

以此进行学术探究。尽管该项目没能满足社区参与的需要, 但是它提供了参与轻量化质性科研的机会, 也提供了听取应用语言学领域个人化学习经历的机会, 这些的的确确都拓宽了学生的体验式学习。

第二年的春季学期我们再次与“铺路石”组织合作。开学之前, 我提前与“铺路石”负责人会面, 了解到他们急需在线上上课的教师, 所以我们学生其实整个学年都在从事志愿者教学工作。“铺路石”还分享了我方学生继续参与志愿者工作的一系列可能性, 包括课程教学、课程协调、课程助理和实习岗位等。我的学生都选择了不同的工作模式, 后期也开拓了各种不同的研究项目。能够见证学生在过程中的不断成长, 我感到很兴奋, 同时我发现在过去几年中, 我们与“铺路石”成功的合作伙伴关系很有可能增强了“铺路石”的信心, 使他们乐于为我校学生提供更多志愿者服务机会。

### 选择教学主题

实施该课程的关键之一是尽早确定可以或应该引入的单元主题。有的主题例如“母语至上主义”(native speakerism)探讨英语教学中的歧视现象、语言帝国主义等概念, 这会让学生大开眼界, 但也会令他们感到沉重。这些话题迫使英语教师们去质疑自己是否想参与到一个可视为不公正、不公平和充满帝国主义色彩的体系中。这虽然是个重要问题, 但我还是希望学生先获得一些课堂教学经验, 体会到教学带来的乐趣和挫败感。

出于这样的考虑, 我决定把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ation)作为课程的开场主题, 这一概念描述了当地英语和全球英语的使用差异。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学生初步挑战母语至上主义(native speakerism)这种一味强调学习“标准”英语的理念。我们观看了一部名为《皮钦语(Pidgin): 夏威夷之声》的纪录片, 该片聚焦“非标准”英语语体对夏威夷年轻人受教育和求职造成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我引入了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和跨语言(translanguaging)的概念, 由此扩展了学生对语言多样性的理解。这两个

“我还要求学生回顾 Barbara Jacoby 有关服务学习核心原则的论述, 找到志愿者教学实践与学术理论相结合的方面, 并印证各类学者的观点。”

This block contains a collage of research topics chosen by students. The topics are presented in various colored boxes and fonts:
 

- Reverse Linguistic Stereotyping: Perspectives from Asian American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 Education Marginalization of Migrant Youths in China
- Linguistic Imperialism: Native English Ideology in the Academic World
- The endangered crisis of Mongolian in China
- News Translation in the Chinese Media Discourse
- Is English the “safe” language of the U.S.?
- Code-Switching in Language Class

上图: 学生们在课程的第二学期中选择的课题示例。



大影响。

课程在秋季学期有两项持续性的作业。首先, 学生要与他们的教师搭档共同完成“对话周记”的写作。每周有一名同学先写下一篇周记, 内容是对本周课堂的观察和思考, 然后同组的其他同学写下第二篇(或第三篇, 三名同学为一组)周记, 他们须从自身视角出发对前者所述做出回应, 也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观点。“对话周记”要从教学的第一周一直持续写到学期末, 它为学生撰写期末反思论文提供了宝贵的灵感资源。

第二个持续性作业是学生对每周上课主题的思考性写作。学生必须对所给出的开放性问题进行独立思考, 通过写作分享他们的学术关注点以及其与“铺路石”课堂教学的联系, 除此之外, 他们还须分享自己作为语言学习者的感受。每位同学提交作业后还要与另一位同学结成对子, 互相点评所写的内容, 给予反馈。从某种程度上说, “对话周记”和“线上论坛写作发布”之间存在部分的共生关系, 因为学生经常将他们所读/所见与每周的教学志愿者经历联系起来。尽管如此, 我并没有过早地要求他们把所有的感悟和观点梳理清楚, 形成条理明晰的文字, 而是等到期末再要求他们撰写整体性、系统化的反思论文。

期末反思论文的核心要求是学生必须掌握自身学习过程的方方面面, 并进行全面整合, 总结出问题所在。我还要求学生回顾 Barbara Jacoby 有关服务学习核心原则的论述, 找到志愿者教学实践与学术理论相结合的方面, 并印证各类学者的观点。

春季学期时, 学生会选择一个应用语言学研究主题, 并从某种程度上继续参与到“铺路石”的志愿者工作中。每年学生的参与模式都不尽相同。第一年受到疫情因素的影响, 学生无法继续从事志愿者教学, 而是开展了一个“故事团”类型的项目, 即通过访谈人们的语言学习经历或教学经历,

“我鼓励学生提供一种“值得孩子花时间”的学习体验,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有某个语言学习成果。”

“我可以将社区参与式学习的元素整合到我教的所有其他课程中去，如此学生将通过与学术文献、同学和社区合作伙伴之间的深度互动增进学习效果。”



概念都强调了说话者的语用意图，即人们从整个语言资源和符号资源中选择合适的方式表达意义、彰显身份。当学生在“铺路石”展开志愿者教学时，他们同时也在探究这些学术主题，并会不可避免地发现英语教学涉及到教什么和如何教的各种可能性。当“铺路石”的孩子们在课堂上使用中文或用不同的方式发音时，我们的学生志愿者就会开始质疑：应该允许学生在课堂上说汉语吗？应该去纠正学生的发音吗？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传递给学生什么信息？

在秋季学期课程的后半段，我们的课堂讨论从对各种语言特征（语音、语法、词汇）的描述演变为语言教学与社会身份之间的联系。我们读了一篇留美中国研究生 Fan Shen 的文章，他提到了学习英语写作令他发展出了第二个“英语自我”。尽管这篇文章是30多年前写的，但仍能引起我班学生个人层面上的共鸣。他们如今正在思考自身语言学习对于身份演变的各种意义。秋季期末时，我要求学生撰写有思考和探究深度的反思性论文，论文必须体现出如今他们看待语言教学的截然不同、更为复杂的视角。这项作业旨在训练学生关注更广大的图景，例如母语至上主义、语言帝国主义等我们在春季学期探究过的应用语言学主题。届时学生还需要基于自身的经历和兴趣，着手确立语言类研究性论文的课题。

### 教学挑战

我教授“语言与权力”这门课程近三年后，意识到教学中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对新手志愿者施以援手。我需要帮助这些新手教师，但同时也需要留给他们犯错的机会和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机会。“铺路石”组织提供规范的课程计划，这对新手教师来讲是极好的资源。虽然拿到这个课程计划并不意味着要照本宣科地上课，但有时候学生志愿者会在遇到困难时钻牛角尖，把教学失败归咎为僵化的课程计划。回顾自己早年的教学经历时，我觉得学生志愿者很有可能会在缺少支持的情况下表现得更好，因为这会迫使他们备课过程中积极地独立寻找资源或寻求同学帮助。这种“裸身试火”的做法会使学生对教学成功感到更为喜悦，对教学失败则感到更为失落（而不是抱怨课程计划）。

尽管如此，我需要随时提醒自己这不是教师培训项目——我的学生甚至可能并不想成为教师——这个地方也不是教学实验室。“铺路石”的孩子们理应得到一种具备延续性的、稳定的学习体验，而不是从每周的教学成败中吸取教训。基于这种考量，我认为更为稳妥的做法是引导学生使用现有的教案，以及最低限度地尝试教学创新，这也是一种优先为社区伙伴着想的做法。

我教授课程的另一个挑战是关于学生履责的问题，有的学生无法如期履行他们的志愿服务承诺，并将其他很多的任务置于服务学习项目之上。尽管这种低估CEL课程工作量的现象比较少见，但一旦出现以后处理起来十分不易。我们需要及时且有技巧地与学生对话沟通，承认他们现有的繁重学业任务和巨大学业压力，但同时提醒他们曾经对“铺路石”组织和那里的孩子们做出的承诺。

流动人口项目的实施场所通常位于流动人口家庭居住地附近，远离大学或高端社区。学生志愿者需要乘坐地铁和公交远距离通勤才能到达教室开展线下教学。我的第一届课程的学生里有很多人对此感到惊讶不已，仅仅是通勤时间这一项就动摇了多个学生的履职决心。线上授课的学生则面临着“虚拟”的交通问题：各种因素造成的互联网卡顿、学生不愿打开屏幕或是处在嘈杂的背景环境中等。学生们在“对话周记”中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与对课堂教学的反思一样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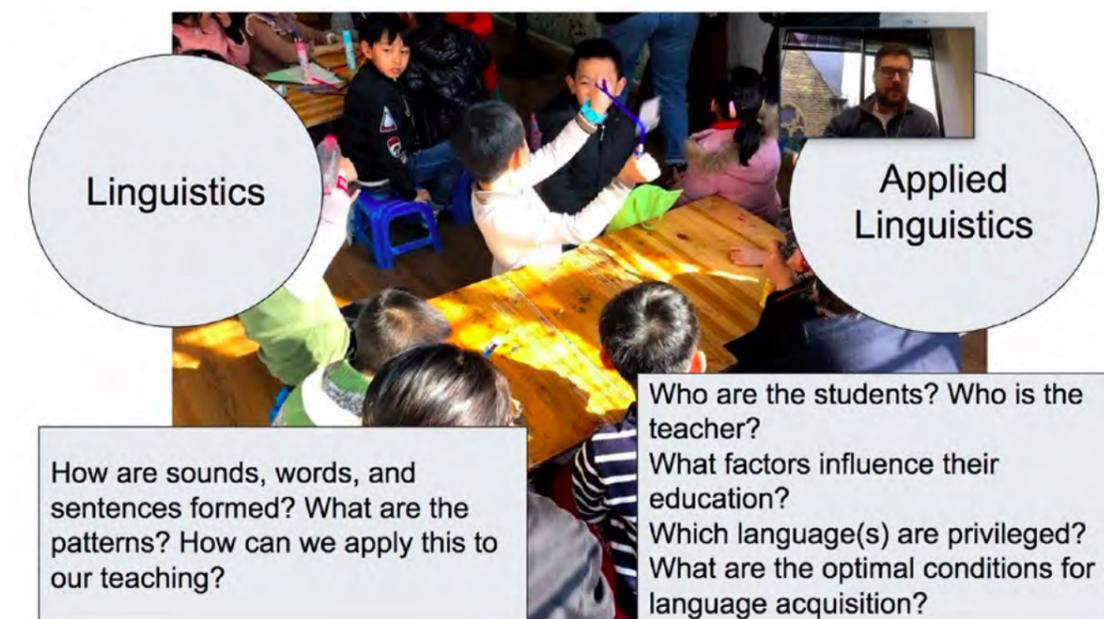
### 课程影响

我看到学生们像我当年一样茅塞顿开，这对于他们是十分有益的。我常跟学生讲，我教了将近五年的英语以后才突然有了这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才终于能够将语言教学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联系起来思考。其实那些脑海里闪现的灵光不必那么高大上，它可能是在教学实践中惊喜地发现了某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学生会把这些时刻记录在周记中；它也可能简单到设计出了某个有成效的课堂活动，或是在某节课上成功控制住了吵闹的孩子；它可能是在课上亲眼见识到了跨语言沟通的价值；它也往往可能是某个学生上课上得很愉快或说出了令人惊讶的话。这些时刻到来时，我为学生感到高兴，因为这就是我爱上教学的心路历程。当学生向我报告某课堂上砸了时，我也对他们的绝望心情感同身受。

我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想成为老师，但看到他们真正地沉浸在自己的体验式学习和所教儿童的体验式学习中时，我不禁感到欣慰。

就我个人而言，这门课程让我能够把过去教学中各种体悟分享给学生。这是一门4学分的课程，不是整个学位，因此我必须艰难地做出教学上的取舍。我必须舍去很多教学内容！但我确实做到了将语言教学、应用语言学和服务学习领域的精髓都纳入课程之中，所以我认为学生学到了优中选优的内容。

除了课程带给我的满足感之外，它也带给了我其他影响。本课程的成功是对将体验式学习纳入本科生学术和专业发展的价值——甚至是必要性的一种肯定。它让我看了当今教育领域的发展已经远超我读大学的那个年代——



上图：Iams 教授在疫情期间线上授课。

“我教了将近五年的英语以后才突然有了这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才终于能够将语言教学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联系起来思考。”

那时社区活动通常不会跟批判性反思或者学术研究相结合。最后，教授这门课程也让我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即我可以将社区参与式学习的元素整合到我教的所有其他课程中去，如此学生将通过与学术文献、同学和社区合作伙伴之间的深度互动增进学习效果。



上图：上海纽约大学的志愿者们每周定期在铺路石不同的网点为孩子们授课。

## CEL办公室 员工之声



钱春豪  
社区参与式学习项目主管

在这门课程中，我发挥了上纽大学生和“铺路石”组织之间的桥梁作用，把我校学生介绍给了“铺路石”的工作人员，并协助双方沟通交流。我还确保我方学生遵守大学有关与未成年人打交道的政策。大学的合规与风险管理部门要求从事儿童工作的人员接受在线培训，由于我们学生的志愿教学对象是青少年，所以我要确保他们在开始志愿者工作之前就完成这个培训。



我在这次与“铺路石”的合作中最大的收获是我们需要尊重社区合作伙伴为服务学习项目投入的管理时间和人力物力资源。我是在跟“铺路石”商拟合同时认识到这个道理的。当时他们提出要向我们收取一定的组织协调费用，我乍一听很吃惊，为了做志愿者而付费这对我来讲似乎有违常理，于是跟他们的工作人员进一步沟通，了解收费的理由。他们与我分享了几个观点：首先，我方的服务学习课程对志愿者的安置有着特殊的要求，这不同于组织对其他志愿者的常规管理，需要额外的工作量来协调；其次，“铺路石”需要根据我方学生的时间安排为他们组织专门的教学培训。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收费和捐赠的收入对于其运营至关重要。

Iams 教授开发和教授“语言与权力”课程若干年后，如今课程迎来了一名新教师。我正在把这名新教师引荐给“铺路石”组织和相关工作人员，从而延续我们双方多年来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同时，我也把我们合作中长期形成的一些惯例传承了下去，这使我受益匪浅。



上图：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CEL）工作人员和 Steve Iams 教授与课程的新教师 Marcel Daniels 教授。



赵莲

“铺路石”上海英语教学项目经理



“铺路石”是一家非营利性志愿者组织，其宗旨在于帮助社会中的弱势儿童发现学习外语的乐趣。它组织志愿者在学校和社区中心提供有趣和有互动性的英语口语课程，从而提升这些孩子说英语的积极性和信心。

我们积极地上纽大“语言与权力”课程项目进行合作，因为上纽大学生在项目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投入度，他们英语口语能力也很优秀；同时 Steve Iams 教授和社区参与协调员钱春豪也给予了我们很大支持。

上纽大的学生圆满地完成了“铺路石”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并提供了一些创意想法和教学建议，帮助我们进一步改进。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帮助上纽大的学生达成他们的实习目标，帮助他们学习、成长，并为他们将来的深造和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我观察到来自这门学术性服务学习课程的学生跟其他人相比做事更有条理，他们的才能与我们的孩子也能更好地匹配。这些上纽大的学生非常努力，有责任心，能够完成各种交代给他们的任务。他们还具有良好的问题解决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等软技能。

“语言与权力”这门课本身就组织得很好，这是社区合作项目成功的关键之一。在我看来，项目创造的最大价值在于建立各方之间的信任和人际纽带，这使我们后续的长期合作水到渠成。



马桢宇

2023 届

我最初是被课程名称“语言与权力”所吸引而选修这门课的。自从我开始在上纽大的双语环境中生活和学习，我就对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很好奇。我还在课程描述中看到了“服务学习”的字眼，这当时对我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不知道“服务学习”意味着什么，但我发现这门课程中我会给孩子上课。我很喜欢孩子，而且觉得这将是一次有趣的经历。于是我填写了院长服务学者项目（DSS）申请，见到了Iams教授，然后就被录取了这个课程。

我此前的教学经验非常有限。高中时我曾在贵州省的一个农村夏令营支教，还在浦东图书馆的英语角开过一次公益课。我感到如果有机会能更长期地教孩子就太好了。“语言与权力”恰好给了我这个机会。

Iams 教授为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学习活动，他将文献阅读和项目服务结合起来，让书本上的理论和知识变得生动起来。我对所学到的“想象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这一概念印象尤其深刻。当时Iams教授让我们读的文献中提到，语言学习者的想象中的社会身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和经济地位有关联，这让我立即回想起贵州夏令营里的农村孩子。我在教流动儿童英语时，发现家长有时在孩子身边旁听。尽管我们的课程是免费的，但家长还是很感激。他们相信孩子有了更好的英语成绩后就能进入一所好学校，这对提升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至关重要。这门课上我可以把所读的文献跟过去在贵州的支教经历，以及我在“铺路石”志愿教学的经历联系起来，我感觉理论和实践之间被打通了。

我记得的另一个概念是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Iams教授提到了几个谬论，比如认为越早学英语就能把语言掌握得越好，或者单一语言环境能令人更好地学习目的语等。这让我想起中国家长对双语幼儿园趋之若鹜的现象，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双语幼儿园，认为让孩子早点身处那样的环境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学习英语。我从文献中读到的内容跟我在现实中看到的现象具有直接的联结，这是这门课的精彩之处。

课上我们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是口音污名化（stigma attached to accents）。Iams教授给我们看了一部叫做《皮钦语》（Pidgin）的纪录片。片中讲述说皮钦语的人受到歧视，因为这种语言不符合标准英语的发音和语法规则。人们倾向于根据口音来判断一个人的语言能力，然而讲话带口音并不意味着讲话质量差，这一观点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Iams 教授给我们布置了各种各样的作业。每节课之前我们需要完成指定的文献阅读，并到在线论坛上发布讨论帖。我们的课堂不是老师的一言堂，而是有很多讨论活动。每个学生都会参与课堂，分享观点，这也许是因为



大家都对这些课程主题非常感兴趣，或者大家都能将课程内容与自己在上纽大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Iams教授也会点名学生回答问题，但我觉得课堂的气氛很好，大家都愿意发言。

## 与同学们合作

通过这门课我还结识了几个好友，因为课程持续了两个学期，所以我们能很好地了解彼此。我觉得通过这门课建立的人际关系与我一学期制的课程中建立的人际关系不同。

“我觉得通过这门课建立的人际关系与我一学期制的课程中建立的人际关系不同。”

我在志愿教学活动中的搭档是一位美国同学。她会讲一点中文，但不太流利，为了拉近与班上孩子的距离，她迫使自己说更多中文。她的学生都很年幼，如果她只用英语授课，那么他们可能什么都听不懂。有时她想用中文表达某个短语，却卡住了不知如何表达，我就会帮她。课程结束后，我觉得她中文流利多了。她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语言，这很有趣。

教学之初，为了完成小组作业我们在课后约见过几次，但我们彼此越来越熟悉后，就基本上只是通过“对话周记”来开展线上讨论，分享我们的教学实践。每周我们中的一个人会先发布心得体会，然后另一个人会给出简短的回复。现在再读这些周记，回顾我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一次次进步，这真的很有趣。我上第一课的时候非常紧张，后来渐渐变得越来越自信。我和我的搭档彼此借鉴对方的教学风格和教学方法。这次经历太棒了，我既是学生又是老师。

Iams教授在“对话周记”中的评论非常有用。我记得有次我在课上提到孩子们有关职业主题的内容时，发现“铺路石”的课件中只有男性警察的图片，而其他职业则只有女性从业者的图片。我没有向孩子们指出这些职业其实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从事，但我在周记中写到了这一点。Iams教授在评论中鼓励我果断地向“铺路石”和孩子们指出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上这门课的缘故，我也许不会对这样的事有如此迅速的反思。后续备课时我根据自己的教学风格改动了课件，并意识到我不必严格按照课件上课。我后期对自己的教学更有信心，也有勇气去对课件做更多的调整，我也向“铺路石”提供了对课件的反馈。

“我和我的搭档彼此借鉴对方的教学风格和教学方法。这次经历太棒了，我既是学生又是老师。”

## 教授反馈与支持

“对话周记”是记录了我学习进程的一种方式，它很特别，因为它不仅体现了我自己的内心对话，还有承载了我和搭档共同的思考。Iams教授提到我们可以从“对话周记”中摘录部分内容整合到期末论文中去。当我翻阅周记条目时，我发现我和搭档经历过同样的困境，也有过同样的忧虑，例如当我们学习口音污名化的概念时，我放宽了英语发音的标准，因为我不想让孩子们形成一种只接受和认可标准发音的意识。我的搭档提到她也放宽了她的发音标准，主要因为担心自己作为美国人会把美式发音强加给孩子们。我看到自己和搭档的成长历程，感觉非常有意义。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进步，但我们有相同的顾虑。我认为这就是“对话周记”的伟大之处。

## 学术学习

我所学到的理论令我能在做志愿活动时批判性地看待观察到的现象。语言系统中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有时我们自身的努力不足以实现这种改变，改变需要整个文化大环境、教师，也许还有孩子家庭的共同努力。举例来说，我虽然在纠正学生发音时放宽了标准，但我也意识到学习标准发音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仍然在教育体系中，也必须参加体制内的考试。如果我们不纠正他们，他们将在考试中失分。要平衡这两个方面很不容易，我总感到左右为难，但我觉得这不是靠我们个人可以改变的事情，也许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尽管如此，我认为仅仅是静静地观察那

些现象就很棒，这门课给我的最大收获就是能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我通过小型的期末个人研究项目收获良多。在这个项目中，我们需要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进行访谈，并整合“铺路石”的教学经验。Iams教授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指导建议和一本语言学的手册，帮助我们起步。他建议我们选择感兴趣的话题，然后深入探究相应的具体问题，我从这一系列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科研经验。

## 学习如何教学

“铺路石”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教学资源。他们事先为我们提供了包含课程基本架构和相关知识内容的教学课件，我和搭档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一些跟孩子们的生活相关的内容。一开始我只是按部就班地教学，后来我从搭档那里学到了很多。在一节有关文具的课上，我们需要教学生诸如“橡皮擦”和“铅笔”这样的词语。我的搭档请同学们拿出铅笔盒，用课堂所学的英语介绍各自铅笔盒里的文具。

我的班级规模很小，只有两个女孩。有时一个学生缺课，我就只教一个学生。孩子们非常聪明。每次我教完课件上的内容都会剩下一些时间，我就用余下的时间跟学生交谈。学生们往往可以读出课件上的句子，但如果像日常交流那样问他们问题，他们就不太能说好，例如用英语自我介绍时，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意识到这一点后就利用课堂余下的时间帮他们练习口语，例如完成了课件中的词汇和内容的学习以后，我会让孩子们谈谈学校里上的各种课。这种交谈对他们更有用，我真的很想帮助他们把英语变成生活中可以使用的工具，而不仅是考试工具。

课程结束后，孩子们都更加自信地使用英语作为交流工具，这让我很高兴。我教了他们两个学期，最后一节课我让两个学生用英语做自我介绍，她们俩都可以比较流利地介绍自己了，而且他们也至少可以进行非常简单的英语对话。我不知道这段经历是否会改变他们对学英语的看法，但我希望他们可以开始在不同的场合中使用英语，而不仅是在参加考试时。

结束“铺路石”的志愿者服务后，我开始更加关注流动儿童群体以及这群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不再只是关于语言教学或语言和权力方面的问题，而是关乎这群孩子本身的问题。这也促使我参加了 CEL 办公室组织的流动儿童夏令营，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经历，对此我很感激。





**Mahder Takele Teshome**  
2022 届

我选这门课确实是因为受到了课程名字吸引——“语言与权力”。我当时正在为自己创设一个聚焦宗教和语言主题的个性化荣誉专业。这门课是关于语言和权力的，这让我很好奇，很想了解更多。

我需要与另外两名学生一起合作提供志愿者教学服务。其中一位是中国人，来自四川，另一个是美国人，我则来自埃塞俄比亚。我们三人被分配到太阳花社区中心站点去教学，上课时间是每周六早上。我真的很享受这段教学时光，因为我以前通常周六早上都只是躺在床上想着下周的安排，此外便无所事事，这让我有点负罪感，而志愿者教学服务给了我周六早起的理由。我们去往教学点的一路上其实很有趣，因为我们三人会一起坐地铁。我真的享受这段时光，从未把它看作一种负担。

我们给大约12名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学生上课。初步了解孩子们后，我必须确保教学内容跟孩子们的学习需求相匹配。虽然表面看上去二年级的英语太简单了，我们没必要给学生复习这些内容，但其实这种复习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不仅是语言使用者，而且是语言教学者，要从后者的角度来知悉相关知识概念。另外，由于我需要与教师搭档合作教学，所以还要做大量协调工作来确保教学顺利进行。

我从这门课程中认识了沟通的重要性。我们三个老师需要一起制定教学方案，并约定分工。我们团队有三个人，所以必须确保三人之间的信息同步。对我们来讲，倾听彼此的看法，尽早决定课程架构，然后按计划行事极其重要。刚开始上课时我们有点忙乱，但后期我们的团队合作变得很顺畅。

有时语言障碍反而会给语言学习创设有利的环境。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太好，所以必须用创意的方式来表达我想说的话。孩子们回应我的时候，我非常有成就感。我意识到有时学生试着理解某个新概念时，不去依赖直接翻译反而效果更好。

## 教学支持

记得有一次 Iams 教授来我们这里听课。尽管从大学课程层面来说，我们是学生，但在那个特定的场景里，我们掌握着比教授更大的权力。在另一个场景中，我们做回了学生而 Iams 教授是掌权人。我会跟他讨论教学进展是否顺利、课堂上发生的事，以及如何改进教学等，这些对话都让我感到很有意义。我真的把这当作一段积极正面的经历，能得到他的反馈意见真是太好了。

“对话周记”让我比之前有了更多批判性思考。在做其他一些服务性项目时，我大多仅限于履行职责，不会多做其他事。然而，在这个项目中我持续地写下对话周记，这可以帮我反思更多，并且更深入地回顾我的教学经历。

我们必须阅读和回复彼此的周记内容，这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段教学经历，例如，我记录了课堂上发生的某件事，我的教学搭档可能也会把这件事写入周记，但她写作的观点会跟我完全不同。另外，我也喜欢跟搭档们分享自己那些成功地鼓励或激励了他人的时刻。

## 学术联系

这门课程中我们确实讨论了所教孩子的语言学习情况。我们真的很想了解他们的生活背景，所以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上海流动人口的问题。我们感知到家庭财务状况或生活现状对孩子上课出勤率和认知事物方式的影响。我们的课堂教学会触及到很多社会现实因素。孩子们的回应有时会跟我们所想的略有不同，或者他们回答的方式有点让我们不习惯，所以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些差异并进行课堂讨论。

上完这门课后，我开始意识到学校官方教学语言带来的语言权力问题。对于很多人和各种社会群体来讲，学校的教学语言是一种正统的英语变体。我将这种语言变体与我自身的受教育的历程、受教育使用的语言以及这种语言带给我的大量机会联系起来思考，这让我意识到语言既是建设不同社会的工具，也是隔绝不同社会的武器，由此我开始更加关注各地的语言使用政策。

我觉得这门课程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对想从事的教育项目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它引发我去思考短期介入是否好过一无所有。我个人现在更热衷于只做长期项目，我不想只是出现一下然后马上消失。

这门课程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已将其列为我自创的荣誉主修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因为它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促使我去选修更多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方面的课程。因此，这门课对我的人生轨迹和个人职业规划有着重大意义，我很感激它带给我的成长。

“这门课程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已将其列为我自创的荣誉主修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因为它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促使我去选修更多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方面的课程。因此，这门课对我的人生轨迹和个人职业规划有着重大意义”



# INTM-SHU 271

## 中国再造

教师之声

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之声

社区合作伙伴之声

学生之声

# 课程概述

一款方便阿姨携带沉重工具的手推车，一些帮助校园商店节省空间的书架，一面使食堂员工拥有休息场所的屏风隔断，这些都是交互媒体艺术专业和院长服务学者项目(DSS)的学生在“中国再造”课程中的项目，其宗旨即是让校园后勤人员的工作状况更轻松一些。“中国再造”课程由交互媒体艺术专业的助理艺术教授 Marcela Godoy 负责教学，也是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CEL) DSS 项目的组成部分。它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探求如何创造性地将废弃材料转化为产品，并响应校园社区成员需求的机会。

本课程中学生相互合作，通过研究和完成原创设计项目来批判性地理解可持续发展。他们学习如何将传统制造技术、新技术和可持续设计理念变为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有力工具。课程学习模式包括授课，嘉宾分享，定期阅读作业，互动讨论，学生报告，项目点评，小组项目，实践活动，以及用废旧塑料等回收废品来试制新材料等。

本课程最初的设计定位并非是学术性的服务学习课程，然而通过与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CEL)的合作，Godoy 教授将课程的主要作业转换成了社区服务项目。上课之初学生与自己大学校园中经常被忽视的成员群体合作，例如食堂员工、清洁工和校园商店人员。CEL 协调员钱春豪联络到了这些部门的管理人员，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纳学生们来为员工做各种项目。春豪和 Godoy 教授得到管理者的肯定答复后，便将学生们分成小组，为每个小组分配一名或一组校工。学生们在采访这些校园工作者并了解他们面临的挑战后集思广益，想出了利用回收材料来满足员工们的需求的办法。春豪说：“这提醒我们有时改善之道近在眼前，就存于我们身处的周边环境，无须往远处去找寻。”



第二年学生与校园附近社区的居民展开了合作。学生们为周边居民设计产品，帮助这些居民发展自身爱好或从事志愿者工作，例如一组学生为在附近巡逻清理垃圾的志愿者设计了工具；另一组学生为退休阿姨制作工艺品展示柜；还有一组学生调研了社区公共花园的运营，并帮助居民制作可以放置花盆的架子，美化了空间。所有产品均来自学生回收的塑料等材料，并用课堂上学到的方法制作而成。

以下为课程实施过程中来自各个视角的详细内容：



## 教师之声：

Marcela Godoy, 交互媒体艺术系助理教授 (IMA)



## 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员工之声：

钱春豪, 社区参与式学习项目主管



## 社区合作伙伴之声：

薛政, 福筑居委会的前负责人



## 学生之声：

Kat Valachova, 2022 届



## 学生之声：

孔小燕, 2021 届



## 学生之声：

陈恺文, 2023 届



上图：学生们正在采访居委会干部，了解社区志愿者清理垃圾所使用的工具。



上图：学生们拜访了位于大学校园旁边住宅区的社区合作伙伴。



上图：学生们教社区成员如何利用回收材料制作钱包。

摘自：

Godoy, M.(2021) ART-SHU 250 视觉文化与社会艺术实践：合作与社区互动（教学大纲）。上海：上海纽约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传播部（2020年12月11日）。课程聚焦：回收利用材料，服务他人。新闻与媒体报道研究创新栏目。

<https://shanghai.nyu.edu/is/course-spotlight-recycling-materials-while-serving-others>



**Marcela Godoy**

交互媒体艺术系助理教授 (IMA)

我的教学理念是“在做中学”。我认为学习很大程度上与合作有关，我指的不仅是与学生之间或者师生之间的合作，而且还包括学生与社区的合作。当我住在纽约时，我开发了一个与可持续性发展相关的项目，提供工作坊帮助为任何想学习用电子垃圾制作项链的人。我不仅对教年轻人感兴趣，也对教各个年龄段的人感兴趣。



## 回收塑料制成新材料

我是一名设计师且喜欢设计东西，但当时我没有太多资源，所以我开始寻找可以充当作品设计材料的垃圾，还创建了一个相关的教程。我很想把这种技术分享出去，而不是作为商品售卖。当我搬到中国时，我没有发现在纽约设计时用的那类垃圾原料，但我确实在上纽校园里发现了很多3D打印机和包装塑料产生的垃圾。塑料垃圾随处可见，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研究将塑料回收成新材料的原因。我遇到了一个名为“珍贵的塑料”（Precious Plastic）的上海公益团体，他们有可以回收塑料的机器。这就是我在这个领域进行试验的开端。



## 与当地人接触

我在上海已经住了多年。我喜欢和邻居打招呼，向公寓楼里所有清洁阿姨和保安人员问好。我经常看到他们，尽管我不太会说中文，但还是尽可能多地与他们交流。一次有位收垃圾做回收的师傅来我的大楼，我就邀请他来我的班级演讲，因为我想让学生了解垃圾，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在书本上找到。有时候，高手恰恰在民间。学生想了解垃圾背后的知识，捡拾垃圾的师傅大概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黄阿姨是我任教的8楼教室的清洁工。我经常看到她，注意到她在一个小储物间里休息，没有一个可以坐着休息的舒服场所，所以我在网上给她订购了一把椅子。不过我看她并不经常使用这把椅子，后来注意到在中国像黄阿姨这样年纪的人喜欢坐小矮凳。我意识到我为她买的椅子不是最合适的产品，因为那不是她休息的方式。我决定为她设计一个小凳子，用回收塑料来制作模具和搭建它。黄阿姨对这个凳子还挺满意的，也真的用上了它。我只是想为她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让她可以休息片刻并改善她的工作条件。

我第一次开始与我们大学周围的当地人建立联系是通过中文部的教授柴晶，她问我是否想为附近社区的退休阿姨举办工作坊。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机会。在工作坊里我教阿姨们如何使用垃圾来制作产品。因为我



上图：Godoy 教授和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CEL）协调员钱春豪与课程的特邀嘉宾，一位经验丰富的垃圾清洁员。

不会说中文，学生们帮我引导了这个工作坊。对于学生来说这不仅是一次以变废为宝为主题的学习经历，也是一次锻炼语言技能的学习经历。我们正在制造产品，在做中学，同时也通过合作学到不同的东西。

## 教学生解决“真实”的问题

我学生时的专业是建筑。那时我们必须课上开发工程项目，但通常并不会与我们的设计对象有真实的互动交流。我们可以在不考虑预算的情况下做出任何设计创意。相比之下，学生在“中国再造”课程中则需要找到可回收利用的材料来用于项目实施。他们不能简单地去购买新材料，而是在各种受限的条件下完成任务，未来当他们进入工作岗位时也会是如此。

在把“中国再造”转化为一门服务学习性质的课程之前，我曾经教过这门课一次。它的初始版本要求学生找出问题并使用回收材料来提出解决方案，然而学生们选择的研究问题在我看来并不真实，因为他们仅仅在想象谁会用到这个产品，以及此人可能面临的问题。我感到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其实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过于专注于自己的看法或者是有些缺乏实际意义的问题。

我想让学生去寻找实际存在的问题并从真实的设计对象那里获得反馈。我希望学生与他们在上海遇到的人建立联系：例如邻居和其他非学生年龄群体的人。这些情景更真实，也更像是他们将在日后工作中遇到的状况。

## 将“中国再造”转化为一门服务学习课程

我是在 CEL 办公室主任 Diane Geng 的邀请下萌生了将“中国再造”变成一门正式的服务学习课程的想法。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不同于单次的社区工作坊活动，这门课程能令所有学生都参与到社区合作中来，并且他们将作为社区成员设计一个项目。

我认为引入社区合作的好处远不止是学生开发出更好的技术产品。我在课程中增加服务学习的元素，这与我们的课程目标，即学习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非常吻合，它超越了技术层面的知识学习。我试图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新技术产生的结果、我们该如何应对，以及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和相关看法。

我的教学模式是让学生追寻自己的兴趣，我不喜欢定义他们要做的项目，因为我希望他们享受学习的过程。如果他们正在做感兴趣的项目，就自然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也一定会学到东西。

学生们很难在我们为期 14 周的短期课程中创设一个复杂的产品，尤其是由于他们还要学习很多其他课程并且须要与组员协调日程安排，因此他们无法全身心投入到项目开发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让学生加入小组，一起协助做一个项目。我之前的教学大纲包含多种作业，但现在我减少了作业的数量。

## 关于学生团队合作

我让学生选择自己的团队，因为我不想强迫他们与不想合作的人组队。学生们主要根据朋友关系，或者对社区合作伙伴的偏好来做出组队决定。第一节课上我们对一系列的社区伙伴做出介绍，把相应的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学生们报名选择去服务自己感兴趣的社区合作伙伴。

我在授课时遇到的问题有些学生更关注想法而不是在做中学，例如有些学生花费大部分时间与社区伙伴交流，而课程的学习目标中很重要的一步是他们也必须去实验各种回收材料并制作自己的产品模型。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我就很难给他们打分，因为并非所有学生都有着相同的学习体验。



“我想让学生去寻找实际存在的问题并从真实的设计对象那里获得反馈。我希望学生与他们在上海遇到的人建立联系：例如邻居和其他非学生年龄群体的人。这些情景更真实，也更像是他们将在日后工作中遇到的状况。”



“我在课程中增加服务学习的元素，这与我们的课程目标，即学习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非常吻合，它超越了技术层面的知识学习。”



我希望每个学生都能获得使用回收材料进行创作的知识。如果他们从最初就进行了团队分工，其中一个学生可能会在设计理念上有所助益，另一个学生则在产品制作有所贡献，还有一个学生可能会在各个环节辅助，然而他们三人只制成了一个产品模型。但如果每个学生都开发出自己的产品模型，那么整个小组将会有三个可选项，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亲自动手制作的学习体验。未来我可能会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制作自己的产品模型，然后整个团队再决定一起制作最终的版本。



## 与社区合作伙伴的联系

由于我不会说中文，CEL 协调员钱春豪做了大部分与社区合作伙伴建立联系的工作。我跟他一起去跟社区伙伴见面，他会翻译我想说的话，但通常情况下他与社区伙伴一直交谈，然后在把相关情况翻译给我听。我们尝试更多地了解这些社区合作伙伴、他们在社区中所做的事情，以及该社区事务的运作模式。我们收集相关信息并弄清学生可能可以为社区伙伴做些什么。

当我们开始与校园周边社区的人发展合作关系时，我们首先尝试接触附近的小学，但是我们很难跟他们联合起来安排活动。我们更容易与社区中的退休人员合作，这种合作模式进行得很顺利，因为我注意到学生更愿意为个人而不是为某个组织服务。

我们创设了一些机会，让学生可以与社区合作伙伴会面并进一步了解他们，例如我们与当地居民一起举办工作坊，学生们会教他们一些技能，或者他们来教我们一门手工艺。我们还邀请当地居民来校园参加我课程艺术展的开幕式。通过这些活动学生和社区伙伴可以在更自然、更休闲的场景中相互学习和相互了解。

春豪帮我制定了一系列访谈指导，供学生访谈社区合作伙伴时使用。学生提出项目企划之前，应该准备一些访谈问题并收集有必要了解的重要信息。充分利用与社区合作伙伴面谈的机会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见面不易安排。学校方面和社区方面都在努力促成，所以学生要做好充分准备，有效利用会面时间。



## 服务学习的影响

学生项目有时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但他们的收获却比我没引入服务学习时要好。即使学生们的最终产品并不复杂，也没使用很多电子设备，学生的学习体验却更有深度了，因为他们为社区服务且学到了很多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学到的内容。他们的学习项目对与其他人建立人际关系的很有用。让学生看到自己可以为某人服务并使其快乐时，这是很有价值的，他们得到的学习经验也更有价值。

我注意到学校食堂的工作人员至今仍旧在使用班上学生为他们制作的屏风。我看到那些员工在这个有空间隔断功能的屏风后面休息。他们在学校得到了关注，这很有意义，并且我认为对学校的清洁人员也很有意义。我注意到校园工作人员和学生之间有了更多的联系。

“我注意到学校食堂的工作人员至今仍旧在使用班上学生为他们制作的屏风。我看到那些员工在这个有空间隔断功能的屏风后面休息。他们在学校得到了关注，这很有意义，并且我认为对学校的清洁人员也很有意义。我注意到校园工作人员和学生之间有了更多的联系。”



上图：Godoy 教授和中国再造课程的学生们邀请社区成员参加工作坊。



上图：收废品为生的 Yan 先生受邀与学生们分享他的知识。

# CEL办公室 员工之声



**钱春豪**  
社区参与式学习项目主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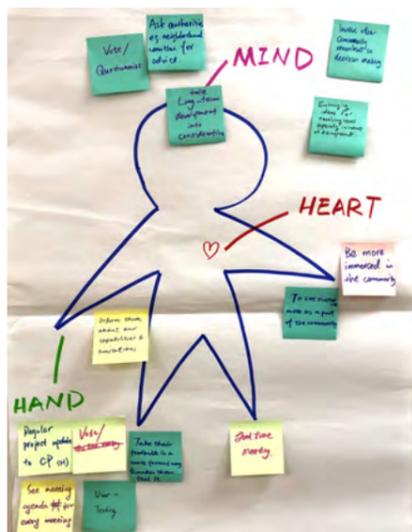
我们原计划与潍坊街道福竹居委会合作实施“中国再造”课程，但由于COVID-19的中断，这个想法直到第二年才实现。我最早是经由汉语项目的柴晶和毕敬红两位教员介绍认识了当时的街道书记薛政，这两位老师一直都带学生去福竹社区与居民互动，从而练习汉语。

薛书记思想很开明，把我介绍给了更多的小区居民，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一直想和我们大学合作，我也总是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当他管辖区域的一名残障儿童需要补习学业时，我帮助他在上纽大招募学生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们自发组织起来，整个暑假都在轮班帮助那个孩子。

暑期时我安排了 Godoy 教授与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会面。经由这些工作人员介绍，我们认识了活跃在社区里的三个居民群体。我与这三组居民进行了交谈，他们都同意成为“中国再造”课程的社区合作伙伴。然而我有时好奇居民们在多大程度上把我们的合作看作居委会分配的任务。这些居民大多是退休老人，能贡献很多知识和智慧，但由于年龄差异、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他们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也可能很困难。

为了拉近学生和社区合作伙伴的距离，我邀请社区合作伙伴来参加学生带领的回收材料再利用工作坊。我通过课间休息时的非正式聊天以及课上正式的期中反思会跟进学生们的社区合作进展。出于对社区合作伙伴的尊重，我们把项目提案发布会放在社区中心的场地举行。课程结束时我做了有关社区合作反馈的问卷调查，并感谢街道工作人员对合作的协助。

学生将邻里居民作为社区合作伙伴来创设和推进项目，我对此的忠告是双方要就合作原因作充分彻底地沟通，并明确界定彼此的目标。我们曾有一组学生由于跟社区伙伴的双向沟通理解不足而遇到了困难。此类问题出现时，社区参与协调员可以从中调和，促进双方之间的对话。每个人都能基于平等的地位谈论自己的设想并进行公开的对话。协调双方一方面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从另一方面讲，我的角色也令人兴奋，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上图：学生们在期中会议上进行了复盘。

# 社区伙伴之声



**薛政**  
福筑居委会前负责人

薛政是福筑居委会的前负责人，他为“中国再造”牵线搭桥，引荐当地居民群体作为课程的社区伙伴。

我与上纽大师生合作的初衷涉及到社区融合的理念——欢迎社区不同成员共建和共享我们的社区。人们不应该只顾自己的利益，大家凝聚起来才是一个社区。社区不仅由居民组成，为了扩大社区的概念，我们试图让辖区内的学校和公司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当今的年轻人有很多想法，他们融入社区会为社区增添更多活力。我们社区的成员年纪都偏大，所以我希望年轻人能为社区带来更多的想法和集体凝聚力。

我们与上纽大的合作证明了我的观点，即融合社区的不同组成部分是切实可行的。我们与上纽大进行了多种模式下的多种合作后，我发现双方的发展轨迹确实可以相交，双边交流互惠是可以做到的。

这种伙伴关系还拓宽了我们社区成员的视野。我总是告诉手工爱好组的老年阿姨们：“不要只是关起门来自我欣赏，你们有好的作品可以与外界分享。”我认为她们真的很享受与 Godoy 教授的交流。当她们参加教授的工作坊，学着用回收材料制作零钱包时，她们玩得很高兴。她们还把亲自做的手工艺品作为礼物送给 Godoy 教授，这种交流对她们来说非常愉快。

然而要老年人不断结识新朋友，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比较困难。她们与陌生的学生从头开始认识和相互了解的进展很缓慢，双方的关系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变得自然熟络起来。我原本还希望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进来，但实际很难动员中青年居民群体加入。大学和社区的这种合作主要取决于居民自身的意愿和每个小区的具体情况。我个人很支持这样的合作，但不是每个社区成员都会支持。我也乐于尝试新事物并不断实现自我成长，我认为思想封闭的人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我们与大学的每一项合作都不会遵循固定设计模式。每一项合作都有所不同，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例如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可能会被临时通知分派去另一个小区去工作，这样我们被迫改变原合作计划；或者有时居民有急事找我，我就必须放下工作优先处理紧急情况。所以从社区角度来看我们的力量仍然比较小，这主要取决于社区负责人是否有很强的意愿投入到与大学的合作中去。

“我与上纽大师生合作的初衷涉及到社区融合的理念——欢迎社区不同成员共建和共享我们的社区。”



Kat Valachova  
2021 届

Kat 与两名队友一起为附近社区里老年妇女发起的艺术爱好者团体设计多个项目。这些学生用回收材料和生物塑料制成各种产品用来保护和展示阿姨们的手工艺品。

### 动力

自从上高中以来，我就对可持续发展以及与社区合作极其感兴趣。我来自捷克乡村，大约 3 岁时我父母盖了一所带花园的房子，因为养鸡一直是我妈妈的梦想。我和动物一起长大，因为我爸爸对自然非常了解，他教我所有植物的名称，还教会了我认识到与自然建立关系的重要性，因而我不会将自然视为理应得到或利用的东西。如果我们有剩饭剩菜，就会喂动物或制成堆肥，因此我总是养成了珍视物品价值的观念。有些东西即便坏了，但仍是可用的材料。

我一个朋友参加了第一届的“中国再造”课程，我看到过学生上那门课的情景。当这门课的第二届放出名额时，我马上抓住机会报名了。同时我也知道 Godoy 教授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很了不起，她学识非常丰富，所以我为什么不挑战自己呢？

### 向演讲嘉宾学习

在上这门课之前我认为我对可持续性了解挺多的，但是当我们邀请了这些演讲嘉宾进入课堂和交谈，开始研究和试验不同的材料并尝试在日常生活中收集废弃塑料制品时，我意识到现实与我所想所知是如此不同。我收集了自己一周内制造的所有垃圾后心想：“这绝不可能是我！”这是一个很好的现实检验，我强烈推荐大家这么做。

Godoy 教授请来了很多来自不同地区的演讲嘉宾，比如有位工作非常努力的收垃圾做回收的师傅。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人生故事。我们也对垃圾如何被回收、什么垃圾被回收和什么垃圾不被回收有了很多想法。Gabriele Tempesta 的演讲也极其有帮助。我做了相关笔记。演讲的主题是以人为本的设计：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并尝试从大局着眼。如果你试图帮助某人，就要总是试着去接近他们，与他们交谈，看看那里的情况并观察他们的行为，因为很多时候人们甚至不会留意到身边的大量资源。你不一定非要从实验室获取材料，而是只需要环顾四周，看看人们如何生活。只要你的思维足够开放，你多数都能当场找到解决方案。我认为这是课程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我也计划将此应用到其他方面。



“在上这门课之前我认为我对可持续性了解挺多的，但是当我们邀请了这些演讲嘉宾进入课堂和交谈，开始研究和试验不同的材料并尝试在日常生活中收集废弃塑料制品时，我意识到现实与我所想所知是如此不同。”

### 挑战

初次会面时我们的社区合作伙伴，那些手工艺爱好团体的阿姨们说希望把工艺品放在展示框中，但这些展示框对她们来讲太贵了。我们立刻就想到用可回收材料制成艺术展示框，并且日后她们可以自己来复制这种展示框。然而当我们开始着手制作产品模型时她们却改变了自己的需求，说“我们将举办一场慈善艺术品售卖会。请你们给我们做些可放作品的礼品袋。”

我和我的队友们听后都感到有点困惑和迷茫。我们不想和阿姨们争论而想让她们开心，但是我们也需要尊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我们已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来完成之前的创作。我意识到应该从一开始就跟阿姨们更明确地界定好项目目标和时间表，这样我们就都能有良好的心理预期。

我和队友们试验各种回收来的生物塑料，制成阿姨们想要的礼品袋，然后很快地再次约见阿姨们展示我们的进展。最终她们看到产品后十分感激和高兴，马上拿出各自的手工艺品放进了礼品袋中，检视包装效果。我可以看出她们像欣赏自己的作品那样欣赏我们设计的礼品袋。我认为这很有意义，就像是这群学生与她们达成了共识，平等地被她们接纳了，这很好。

### 改进之处

如果我们花更多的时间陪伴阿姨们的日常生活，可能会更早地意识到她们真正想要和需要的东西。演讲嘉宾 Tempesta 先生给我们打了个比方：想

“有时人们对他们需要什么有自己的想法，但也许您只需要退后一步，来看清他们真正的需求。”



上图：Kat（左）和同学们与他们的社区伙伴合影。



上图：福竹居委会的居民们来到了上海纽约大学校园参加由学生主持的工作坊。这个工作坊教如何用回收的塑料制作钱包。

象有人告诉你他们需要一个钻头来打洞，但他们并不真的要钻头，只是要这个洞，而你可以找到另一种方法来打洞。同样的道理，有时人们对他们需要什么有自己的想法，但也许你只需要退后一步，来看清他们真正的需求。

### 导师和同学的支持

Godoy 教授非常乐于助人。她总是在工作室附近，基本上任何时间只要我

给她发消息，她都会立即回复。她随时准备提出建议并帮助我们，对其他同学也是这样。我们在一个开放的区域工作，这易于交谈。这样你能够想出自己一个人时永远不会想到的主意。CEL 协调员春豪也来到课堂，帮助我们反思我们的设计过程。我们获取了有关项目工作的不同的视角，我认为这非常有用。

### 课程的影响

这门课程启发了我的毕业论文。我是宿舍的宿管助理，曾亲眼看到人们搬出宿舍时留下了的大量垃圾，这很令人痛心。联系课上所学，我感到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我设计了一个虚拟现实的体验促使人们改变消费习惯，并结合一个后续的应用程序给人们提供具体的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去改善这个问题。



上图：Kat 同组组员制作的由明胶制成的生物塑料包装袋和设计模板。



上图：由 Kat 设计的产品 - 由回收材料制作的安全扣和影框。

## 学生之声



孔晓燕  
2021 届

孔晓燕和她的同学们与食堂工作人员，即他们的社区伙伴一起合作。他们制作了一个用于开放空间的屏风隔断，员工可以在下午休息时用它们来保护自己的隐私。这个放置在食堂里的屏风是用各种回收材料制成的。

我选择这门课程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专业的要求。我也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相关主题很感兴趣。此外，我喜欢亲自动手制作东西，所以被课程名字中的“再造”这个词吸引。

### 与社区伙伴见面

我们的第一次正式见面会会很正式。我们都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我方学生打开电脑，这从一开始就向员工表明了我们的正当性。然而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不会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

我相信在正式的会议室之外，在一对一的环境中，或者在员工熟悉的日常工作环境中，他们会分享更多真实和发自肺腑的信息。在这些情境下，他们更有可能真诚地与你交谈。一位担任收银员的员工喜欢与我交谈。我每次去付饭钱时都会和她聊天。我和她说话感觉就是在和一个姐妹聊天，她看上去对我也有同感。我渐渐了解到她在老家有两个孩子，因为疫情一年多没见到孩子了。她不想让孩子来上海，因为她住在局促的环境中，也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他们。她不能带孩子们一起工作。每天早上很早她就得去上班，很晚才回家，感到身心俱疲。

通常我只是和她聊聊这些家长里短，这对我来说很容易。我喜欢跟人闲聊，这让我感觉与他们有更紧密的联系，而渐渐地他们也开始接受你，把你当作他们的一员。渐渐地，他们开始更加放开地聊天，也更放松地提到他们之前不会提起的事情，这就是我的访谈方法。我的成长经历也赋予了我一个访谈员工的优势。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之后移居到上海，我小时候就生活在类似这些员工居住的环境里。

### 确立项目

队友和我在校园食堂发现了多个我们潜在可以解决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设计一种技术避免每天的纸巾浪费。食堂员工也将间接受益，不必再频繁补充纸巾。而最终，我们的团队决定还是要直接帮助员工。可持续发展不只是关于浪费的问题，也关乎对待人的方式。

第二次会议期间我们问工作人员他们在休息期间做些什么。员工们说，他们通常坐在自助食堂的桌子或长凳上玩手机。我们问：“你们有休息区或

“我们经常用技术手段来做  
初创样品来让生活更便捷，  
但我们却很少谈论人”



上图：晓燕的小组向食堂经理和员工征询有关产品原型设计的反馈意见。



休息室吗？”他们说没有。回想起来我认为这在我们心中种下了一个念头，但我们并没有马上聚焦在这个方面。最后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与员工的生活最为息息相关，因而决定用回收材料为他们打造一个能保护隐私的休息区。

我在食堂观察的时候，看到男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会躺在食堂的长凳上打个盹，玩玩手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女性员工却不太可能这样做。我从未见过任何女性躺在休息区小睡。我个人想为女性做些事情，让她们有一个更私密、更安全的区域可以躺下或玩手机，就像男性一样。这让我更加坚定了解决这个问题和做这个项目的决心。

### 获得关于初创样品的反馈

我们做了一个隔断屏风的样品来展示给食堂员工看。他们的脸上露出惊讶之色，就像在想，“哇，你们真的做出了一个东西。你不是随便说说的！”他们的反馈对我们非常重要。他们真的很友善和支持我们的成果，并试用了一周我们的样品。看到他们真实地使用它，看到我们的创造确实提供了帮助，我们很受鼓舞。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或项目。如果出发点是帮助真实的人，那么我就有无限的动力做这个项目。

食堂工作人员能感受到我们做事的诚意。我们通过一整个学期之久的互动与他们建立信任，而不是一两件事或一次采访。我们每周或每两周与食堂员工交流，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建立信任，而不仅仅是通过一两次面谈。

### 团队合作

我和我的队友本可以选择各自做个人项目，我个人也更偏好这样，然而这个项目涉及大量的手工制作，在队友的帮助下更容易按时完成。我们三个人在这个项目上都非常投入，事实上我记得我们班的所有团队都在 IMA 教室努力工作。这是 IMA 交互媒体艺术课程的神奇或独特之处，你能看到大家都在教室里工作，这会激励你也去。IMA 交互媒体艺术专业就有那种积极的氛围！

### 演讲嘉宾的价值

Godoy 教授邀请的演讲嘉宾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邀请了自己社区的一位垃圾收集员来讲述他的日常工作，并分享他所了解的上海垃圾的去向，这令我印象深刻，因为 Marcela 是一位不会说中文的外国教授，却花了很多精力邀请到一位只说中文、口音很重的人来我们班，真的让我很感动。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教授做这样的事情可能更容易，但我们这些本地居民往往会感到这样的人太普通了，以至于习焉不察。

我们还聆听过一位回收牛仔裤的演讲嘉宾的发言。她是外国人但正致力于解决中国牛仔裤生产过剩的问题，视角很不同；还有一位外国演讲嘉宾则谈到了中国的食品安全，这也让我对日常食物有了不同的看法。尽管由于新冠疫情的政策我们无法做实地考察，但演讲嘉宾们将外面的世界带到了我们的眼前，我对此非常感激。我完全感受到了 Marcela 为了使各位嘉宾能受邀来到我们面前所付出的种种努力。

### 个人影响

我想从事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而这门课程毫无疑问推动我在这条道路上前行。我也越来越觉得自己与校园里的工作人员有了更多的联系，不仅是学生和教师，还有那些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的工作人员。

“如果出发点是帮助真实的人，那么我就有无限的动力做这个项目。”



我在这门课程中所进行的一些思考对我之后的研究产生了影响。比如，我毕业后在四川农村进行田野调研时发现了我所做的工作和这门课程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一切都与关注人相关，不是试图提供帮助，而是尽我所能为他人提供更多机会。在我上其他课程时，我很少有机会访谈真实的人，询问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并尝试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而这门课程为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进行这种研究。

### 项目影响

在整个完成项目过程中，我一直忧虑我们究竟是否做了真正有助于食堂员工的事，还是仅仅说服了自己所做的事对他们有帮助。尽管我认为自己和那些食堂员工很亲近，但每次他们夸奖说“我们喜欢（隔断屏风），很乐意在用”类似的话，我还是有所顾虑。

我曾亲眼看见员工用过几次那个隔断屏风，大多数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在使用它，这让我很困扰。我们本出于善意做事，但有时事情可能会走向另一方向，甚至是完全相反方向。不过换个角度想想，至少我们采取了行动，并且我们有了更强的意识。也许我们无法真正影响他们的生活，但我们确实提升了对他们的关注意识，并在这种意识中实现了自我成长。当其他学生看到自己的同学、课程和教授在为我们通常忽视或忽略的人做事时，他们也许会改变自己对待这些人的方式。

“这一切都与关注人相关，不是试图提供帮助，而是尽我所能为他人提供更多机会。”



左图：该组制作了一个隔板，旨在为食堂工作人员在休息时提供更多的隐私。隔板上使用的塑料条是从一个建筑工地回收再利用的。



陈恺文  
2021 届

一款由 700 多个塑料瓶盖和木头拼成，可以承载沉重水桶和清洁工具的手推车是陈恺文和同学们为便于 8 楼保洁员黄阿姨工作所做的设计。陈恺文是就读于上纽大二年级的学生，以下是他对上课体验的回顾。

我出生在江苏，是纽约大学坦登（Tandon）分校的学生。由于新冠大流行，我不得不回到中国并决定在上纽大学习一年。我真的很想了解与中国有关的各种设计，因而被这门课程的标题“中国再造”吸引。

Godoy 教授说这门课中我们将从事社区服务，我觉得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之前在纽约上课时曾做过一个社区服务项目，但项目规模不如这个大。纽约的那个项目为期两周，但是在上海有一整个学期的时间，所以可以做得更全面。在纽约时我们选择一个社区，尝试通过图书馆或在线搜索了解其需求；而在“中国再造”课程中，我们得以在设计之前与社区合作伙伴进行多次对话和调研，走完了一个完整的服务流程。在纽约的课程中，我们仅为当地社区做了一个总体设计；但在上纽大我们则聚焦在服务社区员工个体上。

“中国再造”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社区服务。另一个核心概念则是学习如何使用回收材料制作东西。Godoy 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她教会了我们很多关于塑料的知识，塑料如何污染环境，以及如何将回收的塑料转化为新型材料来进行二次设计，这些确实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社区参与学习协调员钱春豪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课程中社区服务的那部分内容。他改变了我们的想法，使我们从为自己设计或为成绩设计转变为为他人设计，例如我们应该如何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我们如何与对方沟通并询问其要求和需求？

起初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我们的社区伙伴黄阿姨很害羞，回避跟我们交流。她担心自己说的话最终会传到经理那边造成不好的影响，因而不愿告诉我们全部的真实想法。她还认为我们的身份比她高，我们是大学生而她只是一个清洁工，所以她不应该跟我们说话。然而我们一直告诉她，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上纽大学教学楼里的每个人无论是谁，身份上都是平等的。

在一次由钱春豪促成的有关项目面临的挑战的反思会后，他告诉大家他可以加入到我们与黄阿姨的下次会面。那次会面中我们都想采访黄阿姨，但春豪展现出与黄阿姨这类群体沟通的强大能力。他没有一开始就问问题，而是先和黄阿姨聊了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让她逐渐接受与我们谈话。当她变得健谈起来时，春豪就帮助我们开始问更多与项目相关的问题。

之后几次与黄阿姨的会面中，春豪虽然不在，但我们也采用了类似的交流模式让黄阿姨敞开心扉。我们会先去黄阿姨的小储藏室，跟她聊聊项目的进展，我们在做什么，也聊聊她的个人生活。当她变得更加接纳我们时，我们便向她询问了有关项目设计的问题。

我们观察到黄阿姨拖地时经常手拎着一个水桶，那个水桶真的很重。她承认很重，但也不太不好意思承认。我们问她可以怎么帮助到她，她说随便怎样都可以。我们认识到她所需要的是更好的水桶运输方式，于是就开始了制作产品原型。

我们制作完每个原型都和黄阿姨交流，而不是等到最后给她成品才询问她设计是否好用。她当然每次都说是很好用，但在最后她确实提出了一个改进建议。我们已经做出了一款便于她携带水桶的手推车，但还需要在车上添加一个把手，这样更便于她推到各处做保洁工作。我们第一版设计是用一根木制的把手。当我们问她“你想要什么样的把手？”时，她说希望有个东西可以把小车挂在储藏室的墙上，这样就节省空间。于是我们想出了用绳子代替棍子作为把手的想法，因为绳子既可以拉动手推车，也可以将车挂在墙上。当我们告诉她我们给车加了绳子时，她笑得非常开心，她说这就是她想要的。

这里我想特别感谢 IMA 制造实验室的经理 Andy Garcia。Emily 和我每天都在实验室叨扰他，请他教我们使用各种机器。Andy 不在时，有的学长也帮助我们解决了机器的问题。在 IMA 实验室中大家都互相帮助，这真的很棒。

Godoy 教授是回收塑料部件进行二次创作方面的真正专家。我们在为推车顶部制作最后的装饰部件时有些犯难，因为我们以前从未制作过这么大的部件，于是我们向 Godoy 教授请教。她说她能做到，向我们展示了机器的操作方法，我们据此做出了一部非常漂亮的推车。

## 课程收获

我认为这门课程的最大收获是我在为他人思考和为他人设计方面能力的提升。我并不是说自己是一个自私的人，但我通常为自己着想多于为他人着想。这段学习经历让我在与人交谈、说任何话或做任何与他人相关的事情之前都先考虑对方。这个课程把我塑造成一个更好的人。

以前我主要是为自己做设计，很少为别人设计。未来如果我在设计公司工作或者有自己的工作室，我就需要为客户做设计。这节课打开了我为他人设计产品的思路。我现在知道我需要和我的客户进行交谈，询问他们的需求，试着从他们的角度思考，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并且为他们而设计。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知道了如何与像黄阿姨这样的群体交谈，例如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等社会中必不可少的那些工人。这次学习经历之前，我虽然尊重他们，但我不会和他们多聊。我会想“我为什么应该要和那些人聊天？”，但现在如果我坐出租车通常会和司机聊天，有时也会和居住地附近的工人们聊天，这让我成为一个更友好的人。

黄阿姨觉得她跟我们这些大学生不一样，她的社会地位比我们低。尽管实际不应如此，但这确实是一种传统的社会价值认知。我认为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工作既具有挑战性也富有教育意义。我以前只跟朋友或其他大学生一起工作——那些和我类似的人，但这次我和一个完全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合作——她的工作、生活、社会地位，一切都截然不同——而我们仍然合作良好。这真的很有教育意义。

从这段合作关系中，我得知黄阿姨这类群体在上海生活的不易。她早上四五点就要起床，因为从家到教学楼的通勤路程非常长，回家也很晚。她仍



上图：学生们与黄阿姨一起展示着成品。改进后的设计（手推车）采用了圆形的形状和带有拉绳的设计，以便被更轻松地在储藏间里进行收纳。



上图：恺文和他的组员与黄阿姨交谈，了解黄阿姨对项目设计的需求。

“我认为这门课程的最大收获是我在为他人思考和为他人设计方面能力的提升。”



在使用最老一代的 Android 手机，也几乎不打开微信。她和她的家人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居室里，生活条件也不富足。她早上 7:00 来到学校后要工作 10 小时到 12 小时。如果我们没和她交朋友，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这成了我想帮她设计一个好产品，帮助到她的出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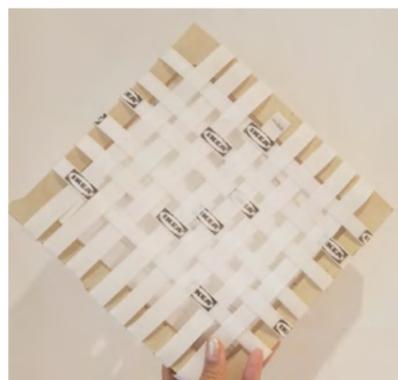
在设计专业的学习方面，我也学到了很多设计技巧。我们切割了很多木头，现在我知道如何使用数控电机和切割机。

项目结束后，我又在上海又多待两个学期。我和我的队友 Emily 和黄阿姨成为了朋友。每次去 8 楼我们都会和她聊几句。之后的那个学期我看到她还在用我们做的水桶推车，心里超级高兴。

上纽大学生为不同的校区工作人员做着不同的项目。为了帮助不同人群而了解他们的不同需求，这对我来说总是很有趣的。其他同学也都为项目努力工作，为各自的社区合作伙伴倾注时间和精力——就像我们一样，这让我深受鼓舞，也是让我受到很大启发的部分。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设计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完成，但整个体验的过程则更为珍贵和具有启发性。



上图：学生们向清洁人员赠送了他们用回收塑料制作的彩色相框。



上图：学生们在为食堂工作人员制作屏风隔断的过程中尝试使用不同的回收材料进行实验。



上图：学生们在中国再造课程中举办的垃圾展览。



上图：社区邻居们参观了垃圾展览，并了解了课程的主题。



上图：一位有代表性的学生每周使用塑料袋的图示。

**ART-SHU 250**  
**视觉文化与社会艺术实践：**  
**合作与社区互动**

# 课程概述

艺术为谁而作？它代表什么，为了什么目的？

作为视觉文化的业内人和创作者，我们如何确保自身具有联结性、投入度、吸引力，和包容度？

地域和文化如何影响我们对作品的思考和呈现？

面对上述问题，跨学科课程“视觉文化和社会艺术实践：合作和社区互动”的解决之道是创设各种立足社会的艺术项目，让学生直接与上海各个社区接触互动，包括让学生参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ower Station of Art），引导当地儿童基于观展感受进行艺术创作。

“出于对艺术在当代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疑问，我对这方面的话题很感兴趣。” Monika Lin 林耀明教授说道。她为课程选定的阅读文献包括 Hal Foster 的 *The Artist as Ethnographer*、Grant Kester 的 *Art, Activism, and Oppositionality: Essays from Afterimage*、赵川的《当代中国新思虑：艺术与美学的批判声音》，以及 Amy Pleasant 的 *Artists as Activists: Pursuing Social Justice*。

“学生们似乎特别喜欢以艺术为视角探究世界，而不是把艺术仅仅当成一个产品”，她说道，“而且他们自身能够与他人创造性地互动。”

“视觉文化和社会艺术实践”这门课程有两大教学目标。首先，学生将了

解中国社会艺术实践现状。其次，学生将通过校外拓展活动和合作项目与上海本地民众有直接的接触。他们会通过社会实践和相关的艺术实践与当地社区群众有直接的、艺术性的互动，同时他们也会认识到自身与社区的关联性。林教授和她的学生曾在艺术博物馆、公办学校和认知症老人看护中心举办过多场艺术工作坊。

在视觉艺术方面，学生通过有意识地参与社区活动，一方面可以促进自身对视觉文化语言的思考创新，另一方面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自主性和积极性。此外，学生能够在人际交往和团队合作方面积累很多经验，这能为他们的专业学习和未来的人生提供有力支持。



上图：参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以下为课程实施过程中来自各个视角的详细内容：



## 教师之声：

林耀明，视觉艺术助理教授



## 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员工之声：

钱春豪，社区参与式学习项目主管



## 社区合作伙伴之声：

马国栋，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员工



## 学生之声：

Chelsea McLean, 2022 届



上图：志愿者引导当地的孩子创作以参观博物馆展览为灵感的作品。



摘自：

Lin, M. (2022) ART-SHU 250 视觉文化与社会艺术实践：合作与社区互动（教学大纲）。上海：上海纽约大学

Reynolds, E. and Lord, K. (2018 年 7 月 6 日). 文化与社会艺术实践：合作与社区互动。NYU 新闻。

<https://www.nyu.edu/about/news-publications/news/2018/july/cool-course-alert--visual-culture-and-social-art-practice--colla.html>



**Monika Lin**  
视觉艺术助理教授

我本科是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创意研究院读的。当时，我就开始涉足社区参与式学习。当时创意研究院的研究范围覆盖了从视觉艺术到数学的多个学科领域，不仅包括普通人印象中的创意艺术，还包括科学、文学和其他学科内容。大多数教授都会让学生提交与课程主题有关的作品作为期末考核的形式。以数学为例，我曾创作一首小提琴曲并解释曲谱背后的数学性思考，以此作为期末作业。这种学习模式让我更广泛地思考艺术是什么，以及如何塑造艺术。

上述学习经历和我的个人经历促使我组织了一项“为流浪者而表演”的活动。该活动是一场学生表演晚会，所有的门票收入都捐给了一个致力于帮助特定流浪家庭的公益机构。当时我确实受到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那些款项本可以有其他更好的去处，例如食物救济站点等。我知道食物救济站点这个主意很棒，理应得到资金支持，但当我想到一笔捐款可能给某个家庭带来积极影响，那种感觉很不一样。这是我以人性化、个人化的方式建立援助关系的起点，我并不想被视作恩人。

从那时起，我总是通过某种方式将所做之事与社区、基层筹款或是包含社区的艺术实践等各种思考联系在一起，但这种方式并不一定是我所谓的艺术实践。要知道1980年代还没有出现有关“社会艺术实践”的各种专业术语，当时社区合作跟艺术绝对是两个不相干的领域。

我毕业后25岁时在旧金山创办了一家非营利机构，这是我理解早期社会艺术实践的开端，也是我涉足教学的开端。我的机构组织了加州大湾区内一群资深的艺术家对年轻艺术家进行指导。我们还进入社区从事教育性活动，并举办艺术展会。

那时我的关注群体是处于危机中的妇女和儿童。当地有个为遭遇各种生活困境的女性而设立的服务中心。我曾经服务过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受虐妇女和儿童，资金紧缺的公立学校和当地社区。我给自己确立的一条原则是：在邀请其他志愿者和艺术家参与之前，我必须亲自进入合作机构与对方人员一起共事。

我的非营利机构通过一系列艺术布展来获得所需的资金，艺术展出中展品销售所得的部分钱款会用作项目经费。我们还组织了年度拍卖会，通过拍卖合作艺术家的作品来筹款，最高峰时有多达40位艺术家参加了拍卖会。此外，我们每年还会为一个慈善机构募集资金。

“在邀请其他志愿者和艺术家参与之前，我必须亲自进入合作机构与对方人员一起共事。”

## 重新参与中国的社会艺术实践

后来我离开旧金山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然后又到纽约教书，我在非营利机构的工作因此被“打断”，最终我搬到了中国。在美国时，我的画廊和博物馆事业非常成功，然而在中国像我这样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国际艺术家，缺少在美国时的那种人脉支持。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够出售作品，这让我开始从事非销售性质的工作。我的工作不再是创作可供人们购买的作品，这也促使我与当地展开社区合作。

这种工作模式可以追溯到我在旧金山时做的公益活动，但在中国我终于将我的社区工作本身作为一种艺术实践，而不仅仅是与实践相关的，却非并实践本身。我开始将自己的社区参与式行为视做一种艺术实践，这很有趣，因为我在美国时几乎从未参与任何当代社会艺术实践运动。中国的社会艺术实践从规模上看还很小，还没有开始形成效应。我如今不必用过去那种产品创作模式思考和工作，因此我大学时代和在非营利组织时的那些冲动又重新涌现了出来。

## 任教于上纽大

我开始在上纽大任教时，对教学工作有了很新的展望。版画和绘画是我最早任教的两门课程。即便是通过这两门课，我也认识到学生们迫切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版画究竟是什么。我任教的首个学期所布置的期末作业是学生必须在期末作品展上完成一个特殊形式的版画项目，即协助任何普通观展人进行版画创作。该活动是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要求每个学生都出席，并与路过的观展人一同协作，帮助他们创作版画。

正是从那个项目出发，我开发了社会艺术实践课程（Social Art Practice），并于次年实施了这一课程。我很高兴自己没在任教的首个学期就开设这个课程，因为我必须先了解上纽大的学生群体，以及如何与通识专业的学生而非艺术专业的学生一起工作。我意识到自己在上纽大的整个教学行为即是一种社会实践。我们培养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并非为了让他们未来当艺术家——尽管有些学生曾经或者将会是艺术家；相比之下，我们更关注艺术对思维过程产生的影响，以及艺术如何被内化为知识基础、人生态度和处事视角。要实现这种教学实践的转化，唯有促使学生自身走出课堂，走进社区。

## 社区合作关系

我很幸运在实践中与上海的许多博物馆建立了非常稳固的关系。我先联络了民生现代艺术馆（Shanghai Minsheng Art Museum）和上海外滩美术馆（Rockbund Museum），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开业后，我也开始与他们合作。我每年与当代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六到八次艺术工作坊。基于这些合作，他们和我建立了深层的互信和理解。

我也寻求与当地学校合作，不过我只会邀请那些与我有长期合作，并对合作持开放和欢迎态度的学校。例如有的学校每隔半年就会来电询问：“您是否即将举办新的工作坊？您什么时候回来？”这给我的感觉与其他学校非常不同。其他有些学校虽然也欢迎我去开工作坊，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主动与我真诚而平等地沟通。

双方的互信是通过一次次的互动逐渐建立起来的，我通过这样的互动来判断一所学校是否具备合作空间，是否欢迎合作，是否态度宽容。符合这些条件的学校往往秉持更为开放的办学理念，我们之间也一定会持续合作。



上图：林教授观察学生们首次尝试独立组织艺术工作坊。

## 什么是社会艺术实践？

本课程中，学生将理解社会艺术实践领域中各位艺术家从事创作的前因后果。然而，艺术和非艺术的界限很模糊，艺术家的社会实践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界限也很模糊。

尽管我会以自己或其他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案例来给学生们解释社区参与式学习和社会艺术实践的概念，但学生们通常不视其为一种艺术。这没关系，我如何用我的教学方法来应对学生们的质疑是个很有趣的过程。

我总是从一个相对有名的艺术家的创作背景入手讲解，然后再过渡到某个艺术细分领域中知名度较低，但业内认可度更高的艺术家。我在课堂上介绍这些艺术家，并以此为契机带领学生讨论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和社会艺术实践等话题。

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并不一定意味着以协作方式参与社会活动，而是意味着要在主观上形成社会意识。你可以把关系美学看成是“艺术家即英雄”（artist-as-hero）的概念体系框架下的一种思考，但并非必然要把它看成合作。Rirkrit Tiravanija 的大作之一是在知名艺术馆内为人们做饭，前来用餐的都是观展人和某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人。这项作品的关键不在于跨越预设人群、提升社会互动意识等理念，而在于营造一个大家都参与其中的社会环境。这不是一种合作，不像是在说：“为什么大家不进来一起谈谈甲，乙或者丙话题？”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Marina Abramović 是该领域的先锋。你去看展时，她就在那儿，你就坐在她面前，这也许就是实践关系美学的开始。至于社会艺术实践，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合作环境，让合作本身和所有参与者都成为艺术创作者，这两者有很大不同。

我们从这些方面出发了解并审视社会艺术实践，并探讨像艾未未这样的人。他所做的是社会艺术实践吗？这关乎社会意识吗？他在利用别人吗？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进一步真正探讨那些很难被看作艺术实践的实践，例如有位艺术家与当地政府和建筑商合作，重建新奥尔良的某个返迁社区。学生们会问：“这为什么是艺术实践？”好吧，如果你想仔细思考艺术究竟是什么，答案是艺术即是交流。那位艺术家与政府、居民个体合作，倾听他们的需求，他们一起创造了一个优美的，并且是可持续的环境，而不是一件仅供展示或是仅供少数特权者享用的物品。

社会艺术实践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大众不愿将它看成艺术，因为它的受众如此广泛，而且创作人员呈现扁平化层级。如果艺术家不仅仅是艺术作者，那么艺术家的价值会如何被资本基建和艺术机构所定义？他们又会如何理解“艺术家即英雄”（artist-as-hero）？什么让艺术家与众不同？

课程结束时许多学生仍然不认为这是艺术。但这真的重要吗？商业专业的学生可否用上一些我们学的的能力？其实，这个是学生在从事艺术以外工作时可采用的思维模式。这门课是一门艺术课，但其核心是帮助学生掌握那些能从艺术实践迁移到其他工作领域的知识技能。对我来说，这比学生课后不断纠结所做的是否是艺术更为重要。我开始意识到无论人们是否将这些案例看作艺术实践并真正理解它，这种思维模式对他们都很重要。

### 理论奠基和讨论开场

我们阅读和讨论了很多关于自我理解、自我批评和立场分析的伦理学方法论。我希望学生通过阅读 Edward Said 和 Gayatri Spivak 的“他者化”（Othering）以及次大陆（Subcontinents）和第二英语（Second Englishes）等重要的概念来理解种族化（Racialization）。学生需要理解所有这些概念，才能着手进行社区合作。我希望他们了解“做件好事”和建立关系之间的差别，这样我就可以把视线聚焦在帮助学生认识合作伙伴的立场上。



上图：在课程的早期阶段，一个剧团被邀请来帮助学生们练习非语言沟通和团队合作。

“这门课是一门艺术课，但其核心是帮助学生掌握那些能从艺术实践迁移到其他工作领域的知识技能。”

有些实践并非专业术语所指的社会艺术实践，而是许多不同层面上的社会/社区参与实践。有些博物馆或者艺术机构面向的是非常精英化的受众群体，它们不一定会像我期望的那样去接触大众，也许我们能想办法让他们更开放一些。

学生可以找一个切入点来思考例如以下这些方面对他们的影响：自身立场、自身特权或弱势地位、过去经历，或者他们具备的某些学识以及这些学识的影响等。一次课上，我们正在讨论在上海公立学校举办工作坊事宜，一名学生说道：“有可能那所学校的学生从来没有接受过艺术教育。”我心想，“好吧，我来看看是否有其他人会认同他的看法。”事实是没有人回应他，也许因为他的话让大家都感到不快。

我说：“你认为他们没有受过艺术教育的根据是什么？”（该学生非中国公民）。他回答说因为中国教育制度没有创造力。我说“这挺有趣的，你说的绝对符合所谓的外部宣传，但我个人在这方面的亲身经历却截然不同。虽然中国有的学校艺术教育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但它确实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学生不论是否喜欢都必须学习书法和一些传统绘画，它甚至是一门必修课。”

我继续说道：“我们或许能够帮助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拓展自我，但是我们也不太清楚学校艺术课的惯常教法。我女儿在一所中国公立学校上学，她的学校有整整两个专门用于数字媒体和动画等各种艺术教学的房间。我们去考察的另一所学校则没有这些设施，但有中国传统艺术教育。”我问班上的其他同学，“要怎么试着弄清楚我们应该教的内容呢？”另一个学生说：“好吧，也许我们可以问问学生的需求。”这句话是从她的口中说出来的，而不是我的口中。我发现这种开放性讨论的效果远比我单方面传授要好得多。接下来，我会根据后续讨论的进展来决定教学方向。如果学生已经阅读过关于“他者化”（Othering）的内容，那么我们就讨论这一主题，我们甚至可能讨论像“他们”（they）这样的词汇——也许我们可以审视自己为什么使用“他们”这个词，或者我们是如何使用“他们”这个词的，抑或是我们在“他们”这个词的那一刻究竟在想些什么。

### 课程报名须提交申请

我认为 DSS 课程申请流程让学生意识到上这门课不是在选框里打勾那么简单。学生必须通过回答书面问题接受选拔流程，大多数人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非外部压力或学校要求来选修这门课的。

DSS 项目的学生真的很优秀。我曾半开玩笑地说，因为 DSS 学生的那份认真和投入的劲头，我以后再也不想教 DSS 以外的课了。他们显然是对课程有强烈的求知欲。如果学生必须填写申请表才能上课，这意味着他们也会很认真地完成课程的学习要求。这种自发的学习意愿会形成自身的能量。同时学生彼此鼎力相助，他们也能够完成课程所需的工作量。

### 建构学生与社区合作伙伴的互动：6 项核心技能

老师不应预设学生的学习程度，对此我完全认同。我个人认为像搭建脚手架那样建构课程真的很有效，这也是我构建这门课程的方式，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学生需要掌握六到七组特定技能。

起初我真的感到很难界定这些技能。“学生所需掌握的沟通技巧是什么？”沟通可以是身体、精神、口头、书面等各个层面的沟通。有效沟通取决于人们所在的场域，它甚至不只是局限于文化或语言学层面。你的领域是什么？你是商业领域的一员吗？你在艺术领域吗？什么才是有效沟通？以与孩子的沟通为例，我们既要表现得极为明确和谨慎，同时又要保持足够开放，创设空间让孩子们真正投入到活动和学习中去。





1. 沟通技能很大程度上与倾听技能有关。我想学生参加工作坊时可能仍然会想：我有什么可以告诉其他人？嗯，这是当然，不过你实则需要知道的是如何读懂听众。你需要了解如何与人打交道，这无关乎你给予他们什么，而更关乎你从对方那边接收到什么信息，并且准备如何处理它。

我开始审视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我开始思考如果想要组织和推进一个工作坊我需要知道些什么，那个工作坊会是什么样子？我开始制定这份实用技能清单。学生需要什么技能？他们如何在短时间内掌握这些技能？



2. 我们课程初期作业之一是为他人编写一本艺术创作指南。学生可以选择表演、绘画或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他们需要说明该创作的每个步骤，再交给另一个同学来继续完善。接着，他们会将同伴完成的艺术作品与自己的预期作比较。例如，有个学生可能会写：“在页面上画一个点。”但这样的说明还不够好。应该在哪里画点？哪个页面？用什么工具画？学生必须详尽准确地说明每个创作步骤。如果同伴的创作成果与他们的预期大相径庭，这就体现出他们的沟通不够充分。如果你说“在页面左上角画一个点”，你还必须考虑你的教学对象。

如果你说，“拿一张这么大的纸，在左上角画一个点”，那么就要确保跟着你学画的人能用手中的工具画出这个点，也能明白“左上角”的含义，或者——如果你使用测量工具的话——他们就需要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测量单位。例如有个学生在创作指南中提到用“拇指的宽度”测量，而我的拇指和5岁孩子的拇指宽度并不一样。如果学生的教学对象是孩子，也许他们应该说“两个拇指的宽度”。因此，仔细思考这些事情并编写创作指南是一项重要的技能。



3. 下一个我想谈的技能是如何与人相处并克服共处一室时的不安全感或焦虑感。这不仅指的是看着对方的眼睛，还包括环顾四周后很自然地将目光移回到对方身上，即使你需要强迫自己这么做。我们课上会练习如何通过直接的肢体语言来进行非语言交流，传递帮助。学期初，我将一个戏剧团队引入课程，为学生展示非语言交流和团队合作。我们用各种表演方法来隐喻权力动态，还探究小型活动、简单手势或简单游戏的隐喻或另类表达，这两者在技能学习上有共通之处。



4. 我还跟学生一起探讨了商务沟通方面的实用技能。例如他们如何写电子邮件？如何构思邮件？收到邮件与回复邮件之间间隔多久显得比较礼貌？多久显得太快了？尊重他人和动摇自己立场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是合作？你在写电子邮件如何体现出合作？学生如何写提案？他们与社区合作伙伴之间的讨论过程是怎样的？什么可以算作妥协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妥协？学生为了练习这些技能会两两组队，以模拟角色身份互相发送电子邮件。我会检查他们邮件中的语气、语法，并做出评估。学生们会获得一系列的写作模板。在发给合作伙伴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中，他们进行自我介绍，无论谁主笔都需要介绍团队中的每个人。第二份模板则提醒大家如果收到回信需要当天就回复对方，以及各种回复方式。如果你还不知道如何回答，可以说“我现在还不确定，会在特定日期之前回复您”。

我一直觉得这些模板有些说教，但撰写商务电子邮件确实没有太多创新余地。也许学生可以用不同的语气和语言表达，但教给他们良好的工作准则，让他们知道沟通的正确方式很重要。这是所有单元里界定最为明晰、灵活度最小的部分。在这方面我必须做出明确决定，是否给予学生个性化表达的空间，但我意识到那样不会对学生有什么实质帮助，因为他们需要尽快掌握这个技能并马上应用它。我宁愿将更多时间花在发展学生的其他一些技能上。



5. 除此之外，学生还学到了撰写艺术家宣言（Artist Statement）所需的技能。如何确定话题和主题，并将它们转化为艺术隐喻、过程或形态。发展这项能力是一方面，拥有艺术创作能力则是必不可少的另一项。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你也许知道如何画画，但你可能无法通过绘画表达对某个主题的思考——这是另一回事。

在学期的前半段，学生们会完成上述这类作业。虽然这些作业看起来像是单次作业，但实际上它们帮助学生做好后期独立创作的准备，即确立工作坊的主题、探求相关的艺术隐喻以及呈现方式、完成艺术创作指南的编撰、引发大众的兴趣。最终，他们需要将所有这些内容整合在一起。



6. 这个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记录归档。你如何记录当下的行为？社会艺术实践中，人们无法感知到自己的主体性，我们需要仔细斟酌记录的方式、内容和权限。我们在课上讨论了图像制作、图像使用以及音频使用的正当性或不正当性。即使对方允许我们拍照或录像，我们依旧要心怀敬意地使用他们的照片和个人信息，并具有维护对方利益的敏感意识，我们指的是确保每个人在所处的环境中感到自如。



接下来要谈的是我们需要妥当记录什么内容，我们在记录时不仅要相关内容看作一个独立项目，更要把它看作课程的一个环节。我会向学生展示各种项目的网站链接，我们也会一起讨论那些项目中图像传递出的思考，以及相应文字说明对它的加强和削弱作用。什么时候采用视频模式会效果良好，而什么时候非用视频模式不可？那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没有必要做视频，你是否还要拍？这么做的目的和理由是什么？

学生必须记录自己完成工作坊的过程，并把所记录的内容整理成一本作品集。我不需要在作品集里看到前来参加工作坊的人，但我需要看学生在做什么。我通常让学生设置好广角镜头，然后一直待在镜头里边。我不太关注工作坊中的儿童或大人的表现，我真正关注的是学生辅导员如何与各种人互动，协助他们学习艺术创作。

问题自然而然会出现——为什么在那里进行工作坊？——学生会把场地的情况也记录下来。学生需要对场地做研究，以便了解这是怎样一个机构，那里以前是什么，以及他们身处的周边环境。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建筑还是一座新建筑？谁建造的？那儿有多少员工？有多少干活的工人？

学生还必须以艺术实践者的身份对自己展开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比日志撰写更为正式，同时也是评估工作的有效方式。学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代入到个案中去，并且将所读的文献、所思考和讨论的内容都整合到自身的评估中。

学生所记录的内容包括合作场地本身及其历史、他们自己的个人情况、工作坊进展以及工作坊所产出的任何成果。他们如果打算做东西，那他们需要记录自己每一步做了什么。如果学生选择举办戏剧表演工作坊，那么他们必须将表演成果记录下来，同时还需要记录自己的表现，所以他们会需要用两台相机同时拍摄。

以上并不意味着这门课程有着繁重的工作量，而是意味着每个环节都会出现新问题，都会隐含着值得思考的内容。在指点他人的时候，你对服务对象有怎样的预设？你是直接叫对方拿起一把剪刀，还是先确定对方是否有剪刀？如果对方没有剪刀，你是否要了解其中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带剪刀来，还是他们根本买不起剪刀？你不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想当然。没有什么东西直截了当地摆在你的面前，你需要仔细审视所有的一切。看起来会让人变得偏执，不断提出质疑，至少我觉得自己有点这样的偏执倾向。有些同学提出：问到什么地步算个头呢？答案是一直问下去。对于学生来讲最难的部分往往不是身体力行的辛劳，而是不断自我追问、审视、思考和多角度感知所耗费的心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在课程中尽可能地减少商务写作或商务沟通的教学部分，减少这个部分对课程和学生来说会更健康，因为我们不太需要在这个场景里探讨如何写一封信。

## 团队合作

我会请学生定义他们在工作坊中扮演的角色。这个项目的部分成绩来自集体打分，同组的两名学生在这方面将获得相同的分数。项目的另一部分成绩则来自我对每个学生表现的单独打分。如果一名学生在工作坊项目担任领导角色，那么另一名组员应该提供支持。同时，他们必须在项目中期转换角色，以便我分别评估他们各自的表现。

然而，我无法基于工作坊传递的艺术实践理念分别评估学生的表现。在这方面，我只能对团队进行整体评估。以前我们确实遇到过一名成员承担了整个团队的大部分工作，或者个别团队成员无所事事的情况。很不幸，团

队项目的性质决定了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我一边努力推进项目，一边仔细确认团队具体分工的原因——可以将有些角色切分开，分配给不同的学生。

如果有人担任记录工作，那么另一个可以去准备PPT，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他们都在为工作坊付出努力。我记得有个案例中，一名组员做的PPT质量太差，以至于无法在工作坊实践中使用，其他组员不得不重做PPT来达到理想效果。于是我就根据他们最初提交的PPT版本给那个负责PPT的学生打分，而不是根据最终版本。

我经常纠结是否要让学生以团队合作的形式撰写研究论文，但目前仍然在坚持这么做。每个学生都要完成论文的相应部分。研究论文的内容一般包括对合作场地的探究、团队的艺术实践理念以及理念背后的调研等，每个人都需要认领一部分写作内容。这个任务完成起来往往很不易，因为如果某个组员负责的是文章的结论或者最后部分，他就必须等其他组员把前面部分写完才能动笔。学生们对此感到很困扰，但我仍不愿放弃这样的做法，因为我认为大多数人必须学会怎么与他人合作写论文，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完成这种协同写作，总会有人要负责编辑论文或添加新的内容到论文中去。学生们对这项作业的看法褒贬不一，但我至今还不愿放弃这种作业模式。

## 课程对学生的影响

我经常会想起之前一位学生对课程的评价，她说她直到一年后才真正理解课程内容。我刚开始听到这话时一直在想我做错了什么，忽略了什么？她说这门课虽然内容很多，却又好像没做什么具体的事，她花了一些时间才能消化这种状态。这名学生后来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她的专业方向是互动性社会艺术实践。

其他一些学生提到这门课使他们对某个新方面发生了兴趣。例如，有个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说他们意识到需要通过公开的、集思广益的讨论来设计身边的各种基础设施和权力动态关系。

## 课程对社区伙伴的影响

对于孩子，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来讲，大学生来访令他们感到既兴奋又难忘。高中生并不比我的学生年轻多少，他们仍然深受工作坊活动的影响。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体验，而他们能够在沟通过程中感到自己是被尊重的。我认为大多数人对此都有积极的反馈，尽管有时我努力试图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有意义的事，但学生总觉得实际互动比这背后的意义更重要。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之前那位学生说课程结束后很久她才想明白这一点。她当时可能在说：“好吧，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呢？”所以她关注到了实际的互动。而要让学生意识到背后的意义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喜欢社区合作伙伴与我交往的方式，我们已经来往多年，形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这让他们可以坦然地向我提出要求，而不是草率地答应我的请求或者对我表现得过于感激——我认为人们有时会出于尊重而产生一时的错觉。事实上，我认为双方深度的信任来源于对方能够说：“不，我们不能那样做”，“你需要把这项去除”，或者“你可以做些不同的事”，而我也能默契地理解对方。

我的社区合作伙伴几乎每年都会给我打电话或发短信：“你什么时候来？今年打算做什么？”尽管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新生或一个新项目，他们的话语中依然透着些许兴奋，又有些许熟悉。即使需要付出很多额外的时间精力，他们还是非常乐于接待我们，完成合作任务。



上图：课程中的一位学生为孩子们组织艺术工作坊。



“并不意味着这门课程有着繁重的工作量，而是意味着每个环节都会出现新问题，都会隐含着值得思考的内容。”



## 对自己个人成长的影响

我教这门课的原因和收获不同于我所教的其他课程或做的其他事情。虽然我在其他课程中也融入了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ies），但我相信这门课的不同之处在于学生必须要亲自实践——即使有些人起初很抗拒——他们必须走过一段特定的自我质疑历程才能取得成功。学生还需要通过写作来反思他们的学习，他们也会在科研论文中反思服务对象所处的权力动态结构。

学生与学生、与社区合作伙伴的合作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社会艺术实践项目总是让人惊讶和感动。每节课对我都是一个学习机会，这很棒。每年我都会大幅调整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因为我需要跟学生一起了解世界、了解自己，我们都在不断自我进化。

这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我必须具有高度的自我觉知。这门课里我必须引导学生提升觉知，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我必须首先对自己高要求，尽最大的努力达到深度自我觉知。社会艺术实践的奇怪之处在于它既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表演。我们可以把任何行为都看作表演，对吧？但社会艺术实践不同于绘画这种艺术表演，它这更大程度是一种隐含着内在思考的表演，而我的工作是为设置一系列参数标准，促进艺术创作和讨论对话的展开。

这门课程中还有一些因素丰富了我的学习旅程，也带来了挑战。我认为这些因素跟课程本身无关，而是跟我的个人主观性有关。这可能是学生感到很难完成所有任务的原因，因为大家都会带有主观性，并一次次地意识到它的存在。

这是我最喜欢教的课程，但我绝对不能每学期都教它。



右图：学生们在上海博物馆中组织的工作坊的场景。



## CEL办公室 员工之声



钱春豪  
社区参与式学习项目主管

我把林教授介绍给了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这是一家为认知症患者及其看护者提供服务的上海非营利组织，Diane 和我认为这对她的课程来说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上纽大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与尽美所在街道的一个非营利性社区基金会会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将我介绍给了尽美中心的工作人员。

当 Diane 和我初次在校园附近的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参观时，他们的工作人员非常友好，对合作持开放态度。于是我组织了包括林教授在内的上纽大教授到尽美中心参观，他们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也将对方认定为潜在合作伙伴。林教授在选择潜在合作伙伴方面非常周到、谨慎，她花了很多额外时间了解尽美，然后才确定尽美是与课程相适的合作伙伴。后期我还陪同林教授与尽美中心进一步洽谈合作，并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

我们与社区合作伙伴合作时，通常会有意识地寻找对方员工和赞助人感兴趣的机会。例如林教授和 Godoy 教授曾为上纽大的学生组织过一个用旧衣物制成口罩的工作坊。我邀请了尽美员工前来参加这个工作坊，他们都非常喜欢这种体验。还有一次我在尽美中心组织了一场关于痴呆症的纪录片放映，该活动也对他们的社区成员开放。学生、社区成员和尽美工作人员在电影结束后的讨论会上各抒己见，尽美员工们的看法非常有趣，具有教育意义。这些活动拉近了双方的沟通距离。



左图：在尽美长者服务中心举办的工作坊。



**马国栋**  
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前员工



Jerry Ma 是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员工。林教授的学生为尽美中心的认知症老人及其看护者设计并举办了一个艺术工作坊。

我们通常与本地的学校和公益组织有更多合作，但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与上纽大的合作来锻炼跨文化合作能力，同时，我们也想向年轻人普及认知症及其相关知识，并倡导大家对认知症患者保持友善的态度和开放的理念。

社区参与协调员钱春豪在我们的初次会议中引荐了林耀明（Monika Lin）教授。我们讨论了合作的可能性，还向她展示了我们中心认知症患者的艺术作品。我们认为老人们也许能跟上纽大师生一起做艺术项目。

林教授随后来到我们中心举办了免费的木版画工作坊。工作坊办得很成功，它刺激了老人的感官知觉，也为日后双方的 DSS 课程合作奠定了基础。

课程教学中，林教授的学生还为老人们创设了另一个艺术工作坊。尽美长者看护中心给这些学生志愿者们提供了有关认知症的基本知识介绍。我们教他们如何与老年人互动，有时年轻人说话太快，或者宣传工作坊的文案语言过于年轻化，这不符合老年的目标受众。我给学生的项目方案提供了反馈意见，还根据老人的需求给出了我的修改建议，并引导学生们更有耐心地服务老人。

不巧的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无法与学生们在尽美中心实地举办工作坊，而是必须通过微信群非即时地沟通和实施所有项目内容。学生们制作了艺术创作指导视频并发布在微信群中，老人们和他们的看护人观看了视频后在家里自行进行艺术创作。以前我们只做过在线同步工作坊，而这种异步线上工作坊的模式让我们很受启发。

我们与 DSS 课程的合作非常愉快。这个项目对我们机构和我们的老人都很有好处。我们通常会向在尽美中心举办活动的外部组织收取费用，但如果对方的活动对我们助益良多，我们也可以只计算所需人力成本的费用。我们与 DSS 的合作并没有固定的收费模式，但我们与 CEL 协调员春豪和林教授进行了很好的沟通，最终做出了妥当的经费安排。我很欣赏上纽大教员、CEL 协调员和学生与我们坦诚沟通的态度。

我们机构之前曾与一些高中和公司合作举办过认知症科普活动，但其主要目标是帮助大众了解认知症。相较于这些活动，上纽大 DSS 项目的师生投入了更多时间和精力，他们与老人之间的互动也更有深度，还为老人们举办艺术工作坊。他们比我合作过的任何其他学生都更投入、更用心。我认

为这来源于他们的内驱力，学生是想探索一个新主题，还是真正为老年痴呆症患者带来价值？不同的内驱力会带来不同的投入度。

我们和林教授的 DSS 课程的合作伙伴关系非常务实。这个社区参与式服务项目不是表面功夫，而是切实为老人们服务，并将其与学术学习相结合。我个人对这次合作非常满意。学生有时提出了很好的公益服务设想，但这些设想都停留在理论设计阶段，课程结束后就没有了下文，设想最终也没被落实。我感觉，合作完成时如果有一个具体的产品成果，学生的学习体验可能会更完整。此外，一些上纽大学生在这次合作之后还报名参加了我们的其他志愿者工作。

总而言之，我很高兴与上纽大学生互动，也很高兴有机会与一所有名又有趣的大学打交道。我很喜欢参观你们校园，上纽大的校园氛围让人耳目一新。我在日常工作中总跟许多老年人待在一起，因而感到走进大学课堂和与学生一起互动的经历非常有趣。

尽美中心的愿景是与周围的不同机构合作，使人们用更友好的态度看待认知症。DSS 课程让患有认知症的老年人及其看护人接触到更广泛的社会，他们都在微信群里感谢学生们的精心准备。在林教授带领的版画工作坊里，我们看到了大家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表情，虽然有些老人不能很好地用语言表达自己，但他们的肢体语言和眼神已经表明了对项目的认可。





**Chelsea Mclean**  
2022 届

Chelsea McClean 大一时选修了这门课程。她的社区合作伙伴是一所公立中学。Chelsea 和她的同学为中学生准备并举办了一场艺术工作坊。

我主修商务和市场营销专业，辅修中文。我现在大四，来自美国新泽西州。

我大一选修这门课程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门艺术课。我只在课程名称中看到“中国社会艺术实践”，然后想，“哦，这将帮助我了解文化差异，有助于我在商务领域取得成功。”我记得走进教室后吃惊地发现，“这是一间艺术工作室！”后来我才知道大一学生不应该选这门课，它最终成为我大一年级最难的课程之一，但我真的很高兴自己选了它。

这是我第一次选修正式的艺术课，它涉及艺术创作、社区互动、文本阅读和艺术解读等——这些在大学阶段都是我从未涉足过的领域。不过林教授有很深的教学资历，这门课程也开发得非常好。它让我有机会探索这座城市，并与上纽大校园外的当地社区进行互动，这为我整个大学阶段的学习中奠定了活跃的基调。

这门课相较于其他大一课程有很多不同。它要求学生在论坛发帖阐述对艺术的看法并解读艺术作品，也要求学生“设计你自己的工作坊”以及参与林教授的工作坊，还要求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它给我的感觉是极为全面的，尤其是跟我们之前的高中课程相比，那时我们的课程往往只聚焦一个领域，比如数学就是数学，历史就是历史，但这门课给我感觉很有深度，超出了我的预期。

林教授是我刚进校时对我特别宽容的教授之一。我当时很怕在论坛发帖，因为班里有很多高年级同学，而且这又是我第一次接触艺术。我不确定自己的观点是否准确、正确，所以打算不再发帖，也准备承受低分之痛。林教授发邮件给我，说她注意到我没有在论坛上发帖。我跟她解释了我的恐惧后，她说，“如果你害怕发帖，你可以直接把内容发给我。”如此我就不必为公开发帖而焦虑，并且充满勇气继续上课。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如此乐于助人的教授，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虽然事情已经过去4年了，但一切都历历在目。

与学长一起上课是对我而言很有好处，这门课上我结识了一位非常喜欢艺术的学长，同时我还能与真正资深的艺术家互动，这很酷。我主修商科，原本以为做艺术不是一份真正的职业。我记得在大一的必修课全球社会视角(GPS)上很多同学都无法看到课程的意义，觉得它很没用，就好像我所在的高中里学的社会研究和历史课程跟当下的社会问题没有联系。然而学长跟我分享了GPS的重要性，这令我不必完全自己去摸索信息，更令我

“我们能够变得有创造力并在老师鼓励下发挥创造力，这真是太棒了。这门课对商科专业的学生意义非凡，他们很难通过其他途径去实现这种跨学科影响下的艺术感和灵感的迸发。”



获得了不同的视角，教会我用更加开放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我对这门课程印象最深的是艺术实践工作坊。我们小组在一所中学举办了一场有关压力和情绪的工作坊。我们在学校的语文课上了解到学生承受着巨大的高考压力，于是想通过艺术实践方式帮助学生们减压。学生们课后还给我发来短信，我好像已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记，这让我感受到上这门课的价值。

在准备这场艺术实践工作坊之前，我们先在当代艺术博物馆与林教授一起举办了另一个工作坊。作为林教授的助理，我们了解到她举办工作坊的方式，并在工作坊里与孩子们互动，然后设计了自己的艺术工作坊，并完成筹备工作。观摩林教授举办的工作坊对我很有帮助，因为作为一名大一年级的国际学生，我是初次进入像中国学校那样的场所，任务非常艰巨。我们把工作坊计划提交给林教授过目，得到批准后就会跟她一起预演工作坊的流程。我认为这些环节降低了实施工作坊的难度，也减少了我的压力。

我们每周课上都会跟林教授和其他同学一起进行工作坊式的学习，有时也会有外部嘉宾带领我们进行工作坊，结束后我们会记录工作坊的进展情况。现在回顾那些曾经写下的内容，我发现自己当时其实并不明白我们做的事情的意义。这就是我在艺术理解方面的转变过程，而我在当时肯定无法理解这个过程。因此，我现在完全明白这门课为什么不向大一新生开放。

## 课程影响

毫无疑问我能将艺术融入到各个领域的工作中去，其目的不仅为了做好一个项目，而是为了更好的视觉效果和影响力。我最近在做的很多项目都聚焦在艺术和视觉美学领域，但此前我从没意识到将艺术融入一个项目的重要性。如今我喜欢思考不同的概念，并尝试用艺术的方式让事物变得更直观。

有些教授对学生的影响会远超课程内容本身对他们的影响。我上这门课的最大收获是在大学的早期阶段就遇到林教授，因为她确实在很多方面帮助了我。我现在能用艺术的视角看问题，这门课丰富了我的视野，创造性地为我打开了更多的求知之门。

如果你不喜欢艺术，这门课会让你感到困难重重。但一切的付出都绝对值得，你可以通过这门课与社区互动，它还可以缓解你的压力。我们会花一个半小时听课，然后亲自动手进行实践。我们能够变得有创造力并在老师鼓励下发挥创造力，这真是太棒了。这门课对商科专业的学生意义非凡，他们很难通过其他途径去实现这种跨学科影响下的艺术感和灵感的迸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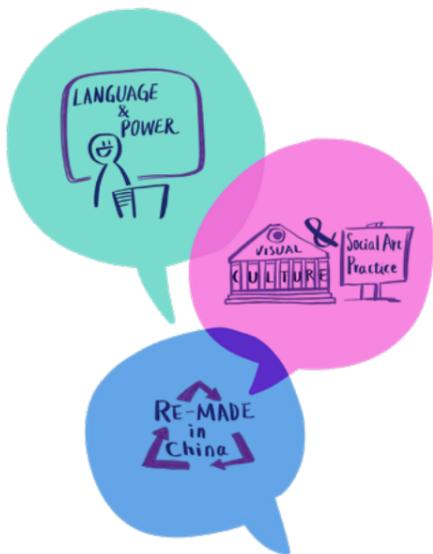
# 结尾

作为一名在公益领域深耕多年的非营利组织创始人、大学管理者和各项社会活动的志愿者，我同时对大学与社区合作中的各方感同身受。有些伙伴关系成果丰硕、互利互惠；而有些合作中，往往某一方付出多于收获。本手册中展示的课程充分体现了互惠合作伙伴关系，使所有参与方都感到受益。正因如此，我希望探究这些课程的设计和实施的“幕后”机制和反思。

## 主要课程特点

这里描述的课程与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具有几个关键特征，这些特征对于它们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 教员有服务社区方面的直接工作体验，他们希望自己的学生也在课程中获得同样的体验。这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准备和指导学生开展社区服务并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有时教师对服务学习的教学感兴趣，但未亲自做过社区服务工作——尤其是在当地社区——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可以帮助这类教员联络机会，让他们能先亲自参与一些社区服务工作来积累设计教学方案所需的直接经验。
- 我校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展示出高主动性和投入度。由于学生必须申请并经历选拔才参加 DSS 课程，他们对于进行社区服务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兴趣，因此他们无法履行对社区合作伙伴的承诺的风险较低。
- 课程要求学生在书面作业、课堂讨论和报告演讲中自我反思，以此作为学习工具来深化学习。这有助于学生仔细回顾社区服务经历，并将他们的观察和面对的挑战与学术研究、个人成长联系起来，从而转化为具体的心得体会。
- 社区合作机构伙伴思想开放，善于沟通。这些负责人具备很好的响应能力和合作态度，这对顺利实施合作计划和有效解决出现的问题至关重要。
- 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CEL）专员促进了双方的良性沟通和信任建立。CEL 工作人员通过努力了解各方的利益，并进行介绍，为各方探索合作可能性打下了信任基础。在上纽大这样的国际化大学中，这通常涉及跨文化交流、语言翻译以及在不同背景的人群之间构建学术与当地社区文化之间的工作规范和期望的桥梁作用。



## 课程发展

本手册中介绍的三门课程代表了上海纽约大学开展和支持学术服务学习课程的三种途径。首先，一位对服务学习课程感兴趣的教师提出教学想法，例如“语言与权力”课程就是这种情况。其次，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确定了具有强烈潜力与社区需求接触并采用教学方法的课程，并与教师探讨将社区服务组成部分整合到课程中。这是“中国再造”课程的情况。最后，对于已经包含社区参与但愿意建立新合作关系的课程，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可以提供建议并帮助引介潜在的新社区伙伴。这是“视觉文化与社会艺术实践”课程的情况。



## 特别鸣谢

基于学生和当地社区居民互惠而精心设计的学术性服务学习课程是能够成功地对接双方的需求，但这不会凭空发生，上海纽约大学领导层营造的充分授权和全力支持环境是我们进行课程试验和创新的关键。

我要特别感谢副教务长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对学术服务学习课程的价值信念，以及对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发起的各项课程的坚定赞助。我对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教务长，文理学院院长 Maria Montoya 以及前任学生事务主任 Charlene Visconti 的鼓励和支持表示感谢，从一开始就对上海纽约大学学术服务学习课程的发展给予了支持。Moh 基金会的慷慨捐助使得众多 CEL 项目得以实施，我们非常感激。最后，我非常感谢教职员工、学生和社区合作伙伴参与访谈，并详细分享了他们对这些课程的反思。

我坚信这样的社区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产生教育价值，因为学生得以从更大的服务工作中思考问题，并将其与学术和个人成长联系起来思考。正因为如此，我希望读者受到手册中课程案例的鼓舞，并认识到学术服务学习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潜力和价值。

如果您想联系我们了解更多信息或交流经验，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shanghai.cel@nyu.edu](mailto:shanghai.cel@nyu.edu)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s://shanghai.nyu.edu/undergraduate/community-engaged-learning>。

*Diane Geng*

Diane Geng 耿欣悦  
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CEL）创始主任  
上海纽约大学学术事务副院长



翻译

贾昉

校对

沈煜 钱春豪

平面设计 & 插画

谢渊沫

MOMO 脑图工作室

上海纽约大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思西路 567 号

邮编: 200126

网站

<https://shanghai.nyu.edu>

联系方式

[shanghai.cel@nyu.edu](mailto:shanghai.cel@nyu.edu)